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书系（港口篇）

司徒尚纪 王元林 主编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南澳港与 海上丝绸之路

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 编
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

黄迎涛 著



SPV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

黄迎涛，字家毅，1967年10月生，潮州市龙湖镇人。1987年于南澳县海防史博物馆从事文物工作。其间发现隆澳东坑仔商周遗址和云澳崩山商周遗址，参与象山细小石器遗址、“南澳1号”抢救性保护与考古工作。组织实施了南澳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和南澳县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编写出版了《南澳金石考古略》《粤海重镇·南澳海防史图录》《侵占南澳日军档案资料实录》等书。在相关杂志上发表考古与文物、博物馆学等方面的文章，包括《南澳与陆岛连桥——试论南澳新石器文化系统与环境演变的关系》《清南澳总兵考》《“海上丝绸之路”的南海航标——从出土陶瓷看南澳的海交地位》《南澳清戍台澎故兵墓与“班兵”制度》《从“南澳1号”明代古沉船出水文物初探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文博体制与时俱进》《博物馆事业与旅游业和谐发展之探索》等60多篇，共45万余字。曾先后参加了国际潮学研究研讨会（共三届）和潮州窑学术研讨会。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书系（港口篇）

司徒尚纪 王元林 主编

南澳港与 海上丝绸之路

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 编
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

黄迎涛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经济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南澳港与海上丝绸之路 / 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 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编; 黄迎涛著. —广州: 广东经济出版社, 2019. 1

ISBN 978-7-5454-5482-6

I. ①南… II. ①广… ②广… ③黄… III. ①港口—研究—南澳县 ②海上运输—丝绸之路—研究—广东 IV. ①F552.765.4 ②K29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9) 第025282号

出版人: 李 鹏

责任编辑: 毛一飞

责任技编: 许伟斌

南澳港与海上丝绸之路

Nanao Gang Yu Haishang Sichouzhilu

出版发行	广东经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11~12楼)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广州佳达彩印有限公司 (广州市黄埔区茅岗环村路238号)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15.5
字数	245 000字
版次	2019年4月第1版
印次	2019年4月第1次
书号	ISBN 978-7-5454-5482-6
定价	4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发行部地址: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11楼

电话: (020) 38306055 38306107 邮政编码: 510075

邮购地址: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11楼

电话: (020) 37601980 营销网址: <http://www.gebook.com>

广东经济出版社新浪官方微博: <http://e.weibo.com/gebook>

广东经济出版社常年法律顾问: 胡志海律师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书系》

编撰组织成员名单

组委会

主任：徐少华

副主任：张爱军 张小兰 周 羲

编委会

主任：张小兰 周 羲

副主任：陈小敏 麦淑萍 黄 尤 彭 贇 庄福伍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培楠 古伟中 白 玲 刘胜利 苏泽群 胡浩民

洪三泰 索健元 黄淼章 蔡玉明 蔡高声

学术委员会

主任：黄伟宗

副主任：司徒尚纪 王元林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叶春生 田 丰 朱 竑 刘正刚 杨兴锋 李庆新

吴松营 冷 东 张 磊 陈永正 陈海烈 郑楚宣

侯月祥 顾润清 徐远通 衷海燕 黄启臣 章文钦

韩 强 曾 骐 谭元亨

书系编辑部

总主编：黄伟宗

主 编：司徒尚纪 王元林

港口篇编辑部

主 编：司徒尚纪 王元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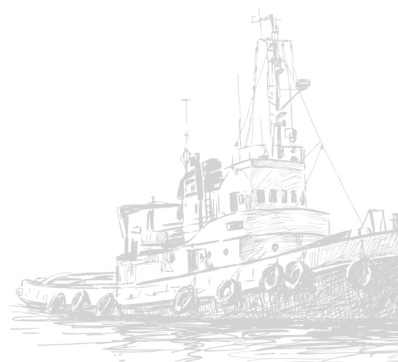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刘 强 汤苑芳 许桂灵 李 燕 李坚诚 李爱军

陈立新 孟昭锋 黄迎涛 熊雪如

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
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
广东省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开发项目组
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
组 编

总序



港口作为水陆运输转口基地，具有客货流吞吐功能；港口拥有陆向和海向腹地，深入广大城乡和海内外地区；港口附近还是临港产业区，可配置各种海洋产业，形成巨大的产业集聚区。故港口实际上是一个经济增长点或生长极，能产生巨大的经济辐射作用，带动周围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举凡世界上临海的国家，无不对港口开发建设重视有加，并将其列入发展当地社会经济不可或缺的举措。特别是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后，世界进入海洋时代，港口在航海和海洋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因而出现不少新港口，直接影响到所在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我国伟大航海家郑和就说过，“财富取之于海”。港口作为扬帆航海的起点，也是财富聚集之地。在古代，广州是我国通往世界各地最大的一个港口，历有“天子南库”之称，广州港税收，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我国自西汉以降，即以合浦、徐闻港为起点，开辟了延续2000多年的海上丝绸之路，与世界各国进行和平、友好、平等的商业贸易往来，也借此进行文化交流活动，因此对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其中广州、泉州、宁波、海口、三亚等港口对此贡献匪浅。

广东濒临南海，海岸线曲折绵长，港湾众多，不少地区自古以来就被开辟为港口，从粤东樟林、柘林、潮州、汕头、南澳、汕尾、屯门、澳门、广州，到粤西阳江、电白、赤坎、雷州，到海南琼州、清澜、三亚，以及广西北海、钦州、防城等，都与海上丝绸之路发生了密切联系，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此，梁启超在《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一文中指出：“今之广东，依然为世界交通第一等孔道。……虽利物浦、纽约、马赛不能过也。”基于广东交通的特殊地位，梁启超进一步指出：“广东非徒重于世界，抑且重于国中矣。”这里所说的“广东交通”，港口是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实业计划》中，就拟定了一个庞大的海洋开发战略，勾画了发展蓝图和布局方案。仅就海港建设而言，孙中山先生提出建设北方、东方、南方3个一等大港，营口、福州、海州、钦州4个二等港和辽宁至海南的15个三等港。其中在广东沿海的就有汕头、电白、海口港，以及汕尾、西江口、海安、榆林港4个渔业港，它们共同形成我国东部、南部海岸线分布的海港体系。同时，孙中山先生将这个海港建设与和它们相连的河流或腹地的整治、开发利用一体规划、设计，形成江海一体、海港和河港一体、海陆并举的建设观。例如建设南方大港（即广州港），其计划就包括了广州港本身的改良、西江河道整治、北江河道整治、东江河道整治、航线疏浚、运河开凿、新地填筑、水闸兴建、物资运输等，涉及多个部门和沿海城市与地区，实广及广州港陆向和海向腹地等问题，无疑是一份珠江流域和南海近岸海域开发规划方案。孙中山先生还将海港建设与海军基地建设相结合，认为开发海洋资源、加强外贸、发展海上航运与海军基地建设都是不可分割的。虽然由于孙中山先生过早逝世，这一计划未能完全实现，但它仍指引了以后我国港口的发展，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港口规划、布局、建设等提供了重要参考。

世界海洋是一个整体，不像陆地相互分割。孙中山先生深刻总结了我国长期海禁、忽视海权导致国土主权丧失、西方列强入侵的历史教训，指出：“自世界大势变迁，国力之盛衰强弱，常在海而不在陆，其海上权力优胜者，其国力常占优胜。”还特别指出，一个国家要掌握海权，必须要有控

制海洋的手段：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这是国家的“富强之基”。而建设海军，必须发展造船业，使中国海军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之一，使中国成为一等强国。为此，在《建国方略·实业计划》中孙中山先生提出“创立造船厂”，“当有一航行海外之商船队，亦要多数沿岸及内地之浅水运船，并须有无数之渔船”。孙中山先生这一海权观和发展海洋经济的思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逐步得到落实，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迅速崛起，中国海军活跃于世界海洋，成为全球重要的海军力量之一。

毋庸置疑，海陆国土开发、海洋产业发展、海洋权益维护，特别是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等，都必须以海港为依托、为基地、为保障，所以，港口建设已成为我国沿海省区的一个重要任务。而广东作为我国最大、最强的一个海洋省，港口建设已被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各项规划、建设方案源源而出，正形成向海洋进军、大力开发海洋的热潮。

在这种背景下，由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指导，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组织，广东经济出版社出版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书系（港口篇）》可谓正合其时，不仅可为广东海洋大省、海洋强省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海洋文化软实力支持，而且可为实施“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决策参考，具有重要的经济、政治意义。

首先，该丛书总结了广东主要海港发生、发展、盛衰变化的历史过程、特点和规律，并提供了它们演变的一系列历史剖面。如千年不衰的广州港，其在历史上数易港址，从南海神庙附近的扶胥港到今海珠区黄埔古港，到20世纪30年代的黄埔港，再到现今大沙地黄埔新港等。虽历经多次变迁，但广州港仍没有衰败，一直发挥其功能，对广州城市商业贸易繁荣发挥了关键作用。又如潮州港，其古代在今潮州市原韩江出海口，后韩江淤积严重，港口南迁40多公里，港址也南迁，遂有汕头港兴起，对促进韩江三角洲经济开发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故认识潮州港、汕头港的历史变迁和两者的关系，对潮汕地区发展战略、产业选择、布局、城市群建设等，有重要参考价值。对于新兴的珠海、深圳等港的历史，该丛书也备述其详，为当今港口的开发利用提供了参考资料。

其次，该丛书对各个港口的海陆腹地勾画了大致轮廓，这对认识港口地位、货流来源、结构和流向，甚有实际应用价值。如新兴的深圳港、珠海港，其现已成为珠江口两大巨港，吞吐量非常大，不仅事关两大特区的经济发展，而且与香港港、广州港、南沙港，以及当前正在发展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关系甚大，该丛书对深圳港、珠海港的阐述，无疑可为环珠江口其他港口发展和协作提供借鉴。又如阳江港，虽原有一些渔港和小型商港，或渔商两港，但因港小、吨位不足，难以支持当地海洋经济振兴。近年来建设的吉树港，可泊万吨巨轮，又配备专用铁路，使其腹地远及华南和东南亚，这为阳江海洋产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保障，是阳江以海兴市、以海旺市的强力支柱。类似这种港口腹地的交代和划分，及其区域关系的剖析，成为丛书的一大重要内容，增加了它们的应用价值。

再次，丛书以港口为核心，充分介绍了相关的海陆资源，从点扩展到面，涉及一个相当大的海陆区域，为海岸带、近岸海洋的开发利用，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广东海洋资源非常丰富，单位面积海洋生产量比同样面积陆地生产量要高得多，效益也大得多，故临海地区比内陆富裕。语曰：“水深处民多富，水浅处民多贫；水聚处民多稠，水散处民多离。”丛书编著者深切了解港口与资源的关系，以相当的篇幅介绍了港口附近海产资源、海岛资源、滩涂资源、城镇资源、旅游资源、历史文化资源、人口资源（如疍民），涉及它们的数量、质量、分布、开发利用现状、存在问题和对策等，并做了较为全面、深入的阐述和评价，可供有关部门参考使用。如《阳江港与海上丝绸之路》一书，即对阳江市境内各大海河港的旅游资源赋存、开发利用做了较为客观、充分的介绍，特别是对海陵岛各景区的介绍，颇为翔实，读后如置身其中。这对认识这个国家级旅游景区、吸引游人，甚有裨益。其他诸作，也无不如此，故本丛书虽曰港口丛书，实无异于区域社会经济文化丛书。

此外，该丛书发端于海上丝绸之路，归结于“一带一路”，达到古为今用、为现实服务之目的，具有学术与现实相结合的时代特色，可供相关研究比照参考。广东沿海港口多有悠久历史，且其兴起和发展离不开海上丝绸

之路的兴衰。这其中涵盖了港口本身的历史、交通线、腹地、城镇群落、区域经济发展等，都直接或间接与港口所及港址、腹地、周边地区开发、海上贸易、海防安全、外交关系等相关，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利害。该丛书各卷，每介绍港口历史，多追溯其兴起的地理和历史基础，尤其后者，多与海上丝绸之路兴起相联系，从中可窥见海上丝绸之路对广东社会经济文化作用甚大，丝毫不让于其他省区。如湛江港卷，即从汉代徐闻、合浦港说起，经历代变迁，到清末广州湾崛起、现当代湛江港建设，大部分时间都离不开海上丝绸之路。又如阳江港，其在南朝时已为海上丝绸之路转口港，宋代海陵岛（时称溲洲）发展为海上丝绸之路补给站。南宋沉船“南海Ⅰ号”在附近海域沉没与此不无关系，该著作对此做了较详尽的介绍。其他各卷，也大抵如此。可知，丛书写作，从其伊始，即有与海上丝绸之路相联系的宗旨，故能有效地指导丛书之编著和出版，也可视为对开发广东海上丝绸之路资源、争报联合国人类文化遗产名录的一个响应。

2013年以来，我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广东很快作出了积极的反应，制定了相应的决策和要求，规定了各项具体任务，形成了响应中央这个重大决定的热烈气象和付诸实施的态势。各地也相应制定了相关的规划、对策与措施。在这种背景下，丛书各卷均设置了一定栏目，专述各港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关系，提出相应的建议，供有关港口政府决策参考。这包括各港口的历史梳理，港口运作的经验启示，宜采取的政策、技术、措施等，不仅有助于港口建设，而且对它们所在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也大有裨益。白居易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该丛书是实践了这一古训的。

再者，该丛书的很多内容是作者野外调查所得，明显地补充了历史文献、现代各类资料的不足，使之更具可靠性和真实性。如湛江港、潮州港、汕尾港、茂名港等卷，作者就深入港区现场考察，走访当事人，实地观察港口历史、现状，拍摄大量照片、绘制相应的地图等。这也说明，即使当今科学昌明、GIS技术发达，但也不能取代野外考察，后者仍是涉及区域的科学研究所不可或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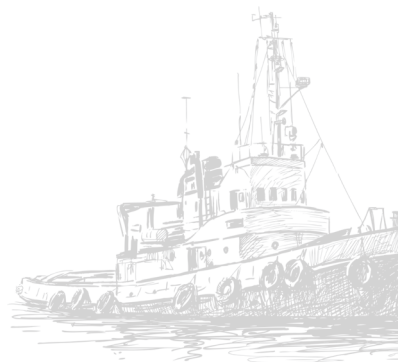
最后，本人作为该丛书的一位主编，以上所言，难免有偏爱之嫌，敬请有关部门、地区和读者批评指正，是所欣幸。

是为序。

司徒尚纪

2018年1月17日于中山大学望江斋

前言



南澳，“海上丝绸之路”的南海航标

南澳，濒临西太平洋，位于粤、闽、台三省海上交界处，地处中外交通咽喉，是广东省唯一的海岛县，面积112.4平方公里，人口7.2万人。这里山川灵秀，风景优美，人文荟萃，文物丰盛，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保存着光辉璀璨的古代文化遗产。这里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被誉为“潮汕屏障，闽粤咽喉”。这里海岸线曲折，大小岛屿星罗棋布，是国际贸易货物的转运、集散中继站与必由之路。

考古发现表明，南澳早在距今8000年前就已有人类活动，是目前粤东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人类文化遗存。这也说明在地球最后一次冰川期结束前，南澳为东山岛、南澎列岛、澎湖列岛至台湾陆桥中的一站，是台闽粤之交通要冲。象山、东坑仔、崩山等遗址的考古发现，表明南澳先民已通过“陆岛连桥”与附近先民有生活、生产上的来往，在文化渊源上有着密切关系。他们是开发海上航路的先驱，是粤东、闽西南海上贸易最早的一批开拓者。

元朝在潮州建立政权后，认识到南澳的重要战略地

位，曾设兵戍守，然而戍兵即据以叛，便徙之戍柘林。这是南澳海防见之志书最早记载。明初南澳属于海阳县，成化十四年（1478）置饶平县，南澳遂属之，当年只设卫所，但是裁设不定。嘉靖四十一年（1562）十一月移柘林守备驻南澳。然而海洋重涉，不便弹压海上盗寇。嘉靖四十五年（1566）九月遂复设柘林守备，统辖澄海、潮阳二县水兵，可是效果并不理想，南澳为海寇、商人利用如故。明嘉靖年间，时海氛方炽，南澳缩毂，漳潮贼常踞为窟穴，与内地匪类互相勾结，虽有师船防守，以无城堡难资控制。嘉靖三十一年（1552）两省当事题准，建三城于澳境。一在深水澳（即今深澳），一在云盖寺（即今云澳），一在龙眼沙（即今隆澳），委潮州同知罗拱辰董其役。拱辰规划监筑，城成，而澳防巩固。2016—2018年，为配合汕头南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段”工作，在后宅镇山顶村鲤鱼山至内湖一带发现了龙眼沙城遗址。原围约六百丈，厚约六尺。残存城基呈“L”形，长356.5米，厚1~1.2米，高1.2~1.3米。残墙以沙石、石灰及黏土分层夯筑而成，其间以条石夹筑，且其下未见墙基。其性质与当时海上贸易相关，为地方性防御工事。明万历三年（1575），福建巡抚刘尧海会同两广总督殷正茂疏请设南澳总兵，九月批复，诏设“闽粤南澳镇”，置“协守漳潮等处专驻南澳副总兵”。万历四年（1576），建南澳城（在深澳）。南澳副总兵“受两省（漳州、潮州）总兵节制，又制两省之兵”。广东沿海的澄海、饶平、柘林、达濠、海门、靖海以至碣石的水师以及福建的东山、悬钟等地的水师都听任南澳副总兵调遣。闽粤南澳镇设左营、右营，左营为福营，右营为广营。隆澳、深澳属广东潮州府饶



2016—2018年发掘的龙眼沙城遗址残存城基



龙眼沙城遗址（局部）

平县管辖，云澳、青澳属福建漳州府诏安县管辖。南澳由此属两省共管，这是南澳建置史上的一大特色。

一、百澳良港

南澳海运贸易悠久，据《马来西亚之发展史》称，唐时已有“巨舶海上，运载土货至广州及闽、浙，或远达南洋、日本，转贩外货输入”。说明在唐时，南澳已建立海外贸易关系了。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南澳同知齐翀《南澳志》载：“漳潮无宁宇，寇乱较唐宋元为尤烈。”安乐博教授在《中国南方的海盗活动及影子经济（1780—1810年）》中更直接指出：“南澳在广东省东边……据文献记载，从唐开始，它就已是海盗的啸聚之处。”

随着当代考古的发展，在隆澳、深澳、云澳地区以及烟墩湾、太子楼遗址附近，我们曾采集或发掘出土大量的唐代瓷器残片。它们让我们看到南澳在唐代时就有类定居的端倪。宋元两代是我国海上贸易和海上交通蓬勃发展的时期，在我国航海史上占有继往开来划时代的重要地位。自隋唐以来，历代居民亦借“密迩番洋，往来交易，事易流传”，并利用岛势“盘错溪山，土膏水煖，可以屯商民贸迁类多奇货，几闽船入广，广船入闽，皆不能外南澳”^①。宋代以前，有关南澳的记载几乎是空白。然而从中国海洋交通航路的考察可以看出，凡东南沿海地区要往南洋一带国家的船只，都要经过南澳海域。由于当时南澳未有定名，故未提及。澳，在南方就是“泊船的地方”，古代南澳岛又称“百澳”，就是形容其可供泊船的港澳之多，天然的良港条件，周边海路四通八达，南澳岛很早就吸引了不远万里驾舟而来的中外商人。

南澳县海防史博物馆在历年考古调查中，曾征集了在云澳官屿附近海域出水的唐越窑玉壁底碗及在南澎列岛附近海域出水的宋酱釉堆双龙提梁壶。又于2004年1月发现了太子楼附近的宋代建筑遗址。还有2006年5月18日第1号强台风“珍珠”正面袭击南澳，台风过后，在宋井亭下面被海浪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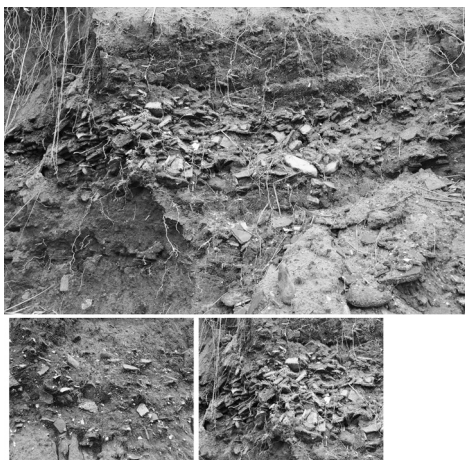
^① 《请设南澳总兵疏》。

空近1米沙层，发现了唐宋铜币近百枚，大部分腐蚀严重或锈结，稍动即碎，无法提取，只有40余枚保存完整。可分辨的铜币有：开元通宝、皇宋通宝、嘉祐通宝、熙宁通宝、元祐通宝、圣宋元宝、政和通宝、宣和通宝等不同年号和书体，绝大部分是小平钱，少量折二钱。小平钱出土时还有钱币系绳残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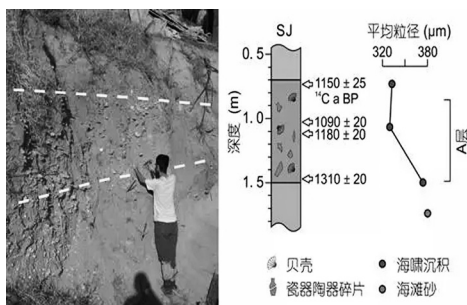
2013年9月20日，第19号强台风“天兔”又席卷南澳，整个宋井景区的护栏及防浪堤被摧毁，在沙层下面暴露了大量宋代瓷片、筒瓦、板瓦、方形地板砖等建筑构件和生活用品沉积物，以及大量贝壳。在调查时还发现了一个残缺的石臼和莲花形凸雕灵芝纹石磨，都反映了当年南澳贸易的繁荣和曾经村庄的繁荣。然而，整个村落明代初期是如何最后消失，却无人知晓。2015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

和空间科学学院、极地环境与全球变化安徽省重点实验室的孙立广、谢周清研究小组两次赴南澳岛进行科学考察，孙立广教授认为是“公元1076年（即北宋熙宁九年，笔者注）的一次海啸灾害……给南澳的文化造成了灾害性冲击”^①。

2007年5月26日，在云澳镇东南的“三点金”附近海域发现“三点金”



2013年强台风“天兔”袭卷南澳后，笔者调查时所拍摄的沉积层照片



《科学通报》之《南澳宋城：被海啸毁灭的古文明遗址》中插图——南澳岛宋井剖面采样及其沉积特征

^① 《科学通报》之《南澳宋城：被海啸毁灭的古文明遗址》。

宋元沉船遗址，共出水黑釉盏、青白釉印双鱼纹碟20件。2015年6月24日，在同一海域发现了“南澳Ⅱ号”元代沉船遗址。在西山大潭东侧海边发现北宋政和三年（1113）和政和五年（1115）两次“捨井乞平安”的摩崖石刻，这是篆记人捐款于宗教的一种活动，其目的在于祈求神佛保佑海上航行的平安，客观上也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活动。尤为可贵的是，它提供了当年有关对外贸易的一些线索，进一步确证了南澳在唐宋时期海上贸易中发挥过关键的作用，是潮汕对外贸易海上船舶驻泊之地。我们可以想象，其时南澳海船穿梭往来，帆樯林立。或靠泊南澳进行补给，或在南澳进行现场交易，或以南澳为出发地，或以南澳为终点港。

二、明代南澳商贸之路与郑和下西洋

（一）南澳海上贸易的条件与影响

“由于得天独厚的水路交通条件，潮汕地区早在唐宋时期就已有相当规模的外贸活动；而进入明代之后，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对外商贸更为发达，潮汕文化与海外文化交流日益活跃。”^① 明朝吸取了元初多次渡海远征而劳民伤财、多招惨败的教训，采取恢复经济的措施，重振了因元末战乱一度萧条的经济，向海外提供商品，开拓海外市场。“明初贡舶贸易盛行一时……及置驿于福建、浙江、广州三市舶司馆(管)之”^②。明代对外贸易方式主要有：允许海外诸国朝贡时，可附带物货交易；中国商船能抵达海外诸国进行交易；沿海居民的走私贸易和欧洲国家转卖。然尚容许沿海以海为生者以小船下海于领取“有号票文引”的通行证后做其民间贸易，只要不带违禁货物下海番国买卖或私海盗，劫掠民者，特允以自由贸易，而外国海商也只要将船内物货尽报官，依数纳税亦允自由贸易。但朱元璋这位明朝开国皇帝一直认为海民下海是倭患之源，必严惩不贷。到了古稀之年还念念不忘海禁，再次申禁人民不得擅自出海与外国互市。明建文四年（1402年），燕王朱棣（即成祖）入京嗣位时第一道诏书就言禁海。成祖继位后又一反祖制恢复市

^① 黄赞发：《潮汕文化形式及其特征》，《沿海新潮》，1994年第3期。

^② 《明史·食货五》。

舶司。但仅为官方贸易。明皇三令五申禁海，户部及一些地方官也相继发出“禁造两桅海船”“寸板不能下海”等禁令。从而影响了整个明朝的海防及贸易，使整个明代海防、海策都处于矛盾之中。

（二）郑和下西洋曾到过南澳

明成祖即位后为“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①，派郑和率舟师带礼品历访南海、马六甲海峡、印度洋沿海及东非沿岸30余个国家。史载：“永乐三年（1405）……中官郑和、王景弘、张文等造大船百艘，率军二万七千余……满载陶瓷、锦绣、布帛，历漳、潮、琼崖，至占城，又沿暹罗湾……至印度诸邦，达波斯湾耀兵西洋。”^②郑和下西洋不但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各国的友谊，在一定程度上也保护了华侨在海外从事商业活动，更重要的是对陶瓷外销起着推动作用，也鼓励了闽粤滨海人民远涉重洋，出海贸易。郑和出使南海诸国亦曾舟经南澳，随郑和出使的黄省曾在《西洋朝贡典录》（卷上）云：“南澳又四十更，至独猪之山，又十更，见通草之屿，取外罗之山，又七更，收羊屿，国东北百里巨口，曰新洲港，港之浒以石塔，其寨曰设比奈，二夷长主之，户五六十余。港西南陆行百里，为王之都城，其名曰占城。”这是郑和船队到达越南中部东海岸新洲港的记载。宣德八年（1433），郑和船队第七次下西洋返航归国。六月三日其船队自越南中部东海岸新州港外罗山出发，据向达校注的《西洋番国志》载：“九日见南澳山，十日晚望郎回山，六月十四日到崎头洋。”在《武备志》的郑和航海图中，也记录了“用艮寅针十更平大星尖，外过大星尖。用单寅针十五更船平南粤（澳）山，外平（澎）山外山，用艮寅针三更船平大甘小甘外过”。

在南澳岛深澳镇古城东北侧原有三保公庙，是民众为纪念明代郑和下西洋时，船队途经南澳而建造的。20世纪50年代被拆。但在每年农历二月初二为福德爷（即土地神）生日祭祀之日，深澳地区的大小福德神都必须集中在原南澳城北门的福德庙前，这些土地神，或以姓名的，或以职官的，或以地名的，种种不一。而在其中有一炷香最为特殊，上面红纸写着“三保大人”

^① 《明史·郑和传》。

^② 《晋江新志》上册《西山杂志》。

的字样。这是民众在遗址旁取土，插上一炷香，然后用红纸写上“三保大人”字样躬送至北门与深澳所有福德神一起进行祭拜，表达了民众对明代航海家郑和的敬意与怀念。

三保公庙是潮汕地区唯一纪念郑和下西洋的遗址。由此可见，南澳是郑和远洋必经之地。

（三）南澳武装海商集团

南澳的海上贸易与我国传统贸易相比，有显著的不同特点，它不是由市舶司进行管理，也是非政府指定的贸易港口，为民间海上贸易。因此，它一开始便以“走私”的形式出现。茅元仪在《武备志》中记载每年“定期于四月终至，五月终去，不论货之尽与不尽也。其交易乃搭棚于地，铺板而陈所置之货，甚为清雅，刀枪之类悉在舟中”。可见，南澳早期的贸易时间较短，每年一个月左右，交易场地简陋。但每当汛风季节，往返南澳的各种商船相望于道，南澳交易盛况空前。在《日本一鉴》卷六《海市》中提到：南澳倭夷常乘小舟，直抵潮州广济桥，接买货财，往来南澳。《福建溪东李氏族谱》也记载：“李兴考为石井陈总兵千户，出入水口，在南澳富有万金。”所以茅元仪在《武备志》中说道：“故中国欲知倭寇消息，但令人往南澳，饰为商人，与之交易，即廉得其来与不来，与数之多寡。”可见南澳成为16世纪中期中外商人接触最频繁的港口之一。尤其嘉靖二年（1523），因浙江省舶司暂停，番舶无所容，乃之南澳互市，期四月终至，去以五月，不论货之尽与不尽也。到嘉靖末年，已有所发展，“倭自福建之浯屿，移泊南澳，建屋而居”^①，可见海商已在岛上建立固定的场所和商店，进行经常性的贸易活动，特别是许栋、许朝光、林国显、吴平、曾一本、林道乾、林凤等海上武装商团占据南澳，使南澳海上贸易发展更快。

明隆庆元年（1567）曾一度开放漳州明港作为通商口岸，但被海上武装商团利用如故，至明万历初这里已经是对外贸易的集散地。随着中外交通的发展，我国传统的出口商品陶瓷除了供应本国需要之外，输出到国外的

^① 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一百三“广东南澳山条”。

也很多，瓷器的外销促进了国内瓷业的发展。“明代（广东）仿龙泉青瓷范围最广，窑址分布澄海、惠来、平远、陆丰、惠州、惠阳、惠东等十八县市。”^①许多瓷器从潮汕地区沿海集散输出海外，从“南澳 I 号”明代古船所装载的大量漳州平和窑的瓷器推断，“南澳 I 号”可能是从漳州明港出发，是东南亚或非洲的走私商船。

地处东南海隅的南澳是“潮汕屏障，闽粤咽喉”，不仅在军事上为兵家必争之地，而且也是外洋和内地商船停泊总汇之地。特别是军事重镇深澳，“内宽外险，腊（猎）屿、赤屿环处其外，一门通舟，中容千艘，番舶寇舟多舶焉”^②。史载：嘉靖二年（1523）倭夷运货物到南澳做买卖。由于南澳“地险而沃，百谷所生，百化货所聚”^③，是海商贸易的理想场所。而“明代潮州之所以能够海商云集，商贸发达，其在地理环境上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重要因素，即位于潮州韩江口外的南澳港。南澳港水路交通十分方便，向北航行可达日本、朝鲜等国，向东南海路可到菲律宾、爪哇等南洋诸国”^④。故扼据韩江口水路要津之南澳，为闽、粤交界各县物资集散中心，其有发展海上贸易的极佳条件。

整个明代海外政策，充满着矛盾。一方面派郑和七次下西洋与海外诸国进行贸易，耀兵异域，使明代贸易和海外交通发展达到顶峰；另一方面又实行“片板不准下海，点货不准贡蕃”达200年的海禁政策。而此时，欧洲地理大发现蓬勃兴起，席卷全世界海上贸易浪潮正越过印度洋，向东汹涌而来。由于海上贸易利润丰厚，即使是朝廷允许的朝贡贸易，贡使也能从中赚到巨额差价，如：100斤胡椒在苏门答腊值银1两，运到明朝便给价20两；日本刀在本国价值800~1000文，明朝则给价5000文。更不用说朝贡之外民间走私贸易，获利更丰。因此，一种新兴的私人海上贸易——武装海商集团迅速崛起，他们冲破朝廷海禁，活跃在东南沿海或远航南洋至印度洋沿岸进行贸

① 叶文程：《宋元时期东南沿海地区陶瓷的外销》。

② 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五册卷一〇三《潮州府》。

③ 齐翀：《南澳志》。

④ 何平立、来可泓：《论明代潮州武装海商集团》。

易活动。

南澳港湾交错，在潮、漳二州交界处“广捕之急则奔闽，闽捕之急则奔广”^①，为明代海商提供冲破政府海禁抵抗官军的庇护地，成为东西洋私人海上贸易的中继站和海上贸易基地。“漳州海商集团诸首领谢策、严山老、洪迪珍、张维海、曾一本、刘香……潮州地区海商集团许栋、许朝光、张链。肖雪峰、林国显、林道乾、林凤……无不以南澳为活动据点。”^②更有吴平、许朝光、曾一本等占据南澳，在岛上占地结寨，他们“装土产往东西洋而去，与海岛诸夷、海商集团相贸易”。是时“四方客货”汇聚于此，“私番船只，寒往暑来……”，以至于官府“欲知倭寇消息，但今往南澳。饰这商人与之交易，即廉得其来与不来，与来之多寡，而一年之内，事前无知矣”^③。可见当时南澳海上走私贸易的盛况。

潮汕地区海商武装集团震动朝廷，朝廷调集大量军队多次进行围剿。明万历三年（1575），诏设协守漳潮等处专驻南澳副总兵，自此，南澳岛从一个贸易自由港变成了一个专门扼守东南门户的海防重镇。除军事上的原因，“其旨也在于控制与扼杀漳潮地区走私贸易发展”。这些既是海上贸易的贩运商人，又是杀人掠夺盗寇的海商集团。铤而走险，“常擅山海之禁以为利”，纵横海上“公开反抗明朝封建阶级，反对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海禁政策及其制度……正是反映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标志之一”^④。

三、清代南澳海上贸易的发展

明末清初，郑成功以南澳、金门、厦门和铜山为据点，在东南沿海举起抗清复明的义旗，“本朝严禁通洋，片板不得下海，而商贾垄断厚赂守口官兵……然后通贩各国……郑氏于是通洋之利独操之”^⑤。它构成清初海上贸易的主要方式。康熙二十三年（1684），台湾归清朝版图，“兵部准广东商

① 茅元仪：《武备志》。

② 何平立、来可泓：《论明代潮州武装海商集团》。

③ 茅元仪：《武备志》。

④ 何平立、来可泓：《论明代潮州武装海商集团》。

⑤ 范咸：《重修台湾府志》。

民人等，愿出洋贸易者呈报当地官府，准其出入贸易”^①，南澳渔民允复旧业。

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廷宣布广东广州、江苏松江、浙江宁波、福建泉州为对外贸易港口，同时设立四个海关。粤海关成立后，潮州府的海关总口设在庵埠，并在潮汕各地设9个征税口和10个挂号小口作为分支机构。南澳在闽粤共管的体制下，隶属的云澳、青澳、深澳和隆澳所发生的民事案件、征税、户口、考试等都应分别到闽之诏安与粤之饶平办理，其交通梗阻，迁延时日。为使南澳总兵专志海防，广东总督郝麟奏请朝廷，于雍正十年（1732）诏设南澳海防厅，派同知一员专职以彰教化。随着海防建设，民众复业，南澳逐步成为编户齐民，向政府输课供役。

在《粤海关志》卷十二《税则》五之“东陇正税口”载：“凡往南澳茶、豆、牛槁等油、土布、干果、水靛：每担收钱六十六文。黄麻、糖水、灰面、杂货：每担收钱三十三文。”在“樟林小口”又载：“凡南澳渡船往来装茶、豆、牛槁等油、土布、干果、水靛、麻布：每担收钱五十文。黄白麻、红曲、咸鱼、篓叶、海山糖员、烟梗、杂货、薯苓：进口八折。麦芽糖、豆、面：进口往府八折。鱼脯：进口往府八折。金针菜、烂铁锅进口、土碗过澳、篷篾四捆作一担、鱼鲑：以上每担收钱三十文。”乾隆四十九年（1784）《喜缘武庙碑记》残碑记载了南澳当地税务机关或监督稽查税务的机关，碑载：“文、左、右渡口汛杨秀达、张学谨……”还记载：“……文口王鹏等。”民国三十五年（1946），陈沅（即陈梅湖）在《南澳县志》卷十《经政》记载：“文口税为清同知署设，武口税为清总镇署设。文口税



喜缘武庙碑记

^① 《大清会典》。

为养廉定，罟罟月规每艘一百五十文，鱼类出口每担二十五文，鱼脯每件二十五文，鱼饭每笞四文，鱿鱼、虾脯及什鱼等类分别价值之高下为差等。武口半之。民国建元，文口归国税，武口为地方税，顾货品复杂，征值不齐，司关者每以为暴。十二年夏，县议会厘定则例，咨县署执行，计货目一百四十种。文口税每担自二十文至百余文不等，武口半之。”文口税和武口税属于南澳特有的征税部门，其目的是解决当地的财政收入。民国十二年（1923），知事陈之英（广东潮安人，字岛岚）在《南澳各区文武口则例专册》序中记载：“南澳僻处海岛，于古无关，自生齿日繁，海利日兴，商货出入伙。总镇以严海禁为词，于是乎有武口之设，同知效之，文口继下焉，南澳无关而有关。光复以还，化私为公，文口既列国税，武口则留为县地方税。”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南澳县财务委员会成立，所有杂税暨归主管各区，由该会设征收处，文武口一并裁撤。

从这些记载中可知，在清代南澳以自己独特的形式设立税务机构，在渡口也设立了文渡口汛和武渡口汛作为监督管理机关，并且分工明确。我们还可以看到，南澳帆樯鳞集，瞻星载斗而来，呈现一派交通海运贸易的繁忙景象，成为粤东、赣南、闽西南的枢纽，进出口岸和货物的集散地。

19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咸丰八年（1858）中英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英国政府将汕头定为通商口岸，设为潮海关。咸丰十一年（1861），清政府正式确认汕头为对外通商口岸，称“汕头埠”。贸易活动中心逐渐转到汕头。自从汕头开埠对外通商之后，资本主义国家控制了潮汕地区的经济，操纵了潮汕对外贸易，传统的海运和海上贸易逐步衰落了。

四、结论

由于历史原因和客观条件的限制，在过去文献资料及论著中，几乎看不到海上丝绸之路与潮汕有什么关系，其主要表现为：首先，潮汕地区没有为封建统治阶级烧制御用的官窑；其次，在有关瓷窑及港口的正史中缺乏记载，故今研究潮汕地区陶瓷海上贸易的论著和考古资料缺乏；最后，虽然有

进行海上贸易的条件，但政治影响和地位不如广州、泉州等著名港口。

从“三点金”海域发现的“宋元沉船遗址”“南澳Ⅱ号元代沉船遗址”“南澳Ⅰ号明代沉船遗址”和“许厝礁清代沉船遗址”以及南澳县海防史博物馆历年征集的海捞瓷器，都见证了南澳海上贸易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繁华和落寞，见证了南澳曾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港口的史实。如今，帆影远逝，百舸归航，南澳这片海域覆盖了多少未知的航海梦，掩埋了多少残舟断楫，我们已不可知。但这些沉睡千百年的古沉船，它们犹如史海航标，引领我们去寻找先人的航迹。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以史为镜，可正衣冠，开放和兼容，将引领我们走向世界。

A calligraphic signature in black ink, consisting of three characters: '黄', '逸', and '中'. The style is fluid and expressive, with varying line thickness and some overlapping strokes.

2018年11月16日于听风庐

— — — — —

目

C O N T E N T S

— — — — —

录

第一章

南澳地理环境与先秦时期居民海上活动

- 一、南澳地理环境 / 002
- 二、南澳与陆岛连桥 / 005
- 三、考古发现印证南澳先民海上活动和海洋文明的兴起 / 011

第二章

秦汉与宋元时期南澳海上贸易

- 一、秦汉和唐五代时期南澳岛航海地位已见端倪 / 020
- 二、宋元时期东南地区重要港口——南澳 / 023
- 三、从出土文物探秘宋代澳前民众生活和民间商贸活动 / 030
- 四、南宋时期南澳与太子楼遗址的考证 / 034
- 五、“沉东京，浮南澳”及“东京路口”的考证 / 040
- 六、元末“明教”在南澳活动的考证 / 045
- 七、宋元沉船遗址见证南澳的繁荣和海贸昌盛 / 048

第三章

明代海禁政策下的南澳港自由贸易

- 一、南澳与南澳港 / 054
- 二、13—16世纪倭寇入侵 / 056
- 三、海禁政策和武装海商集团的活动 / 059
- 四、剿灭吴平与南澳设镇之争议 / 078
- 五、郑和下西洋舟经南澳和南澳福德爷生祭郑和 / 086

第四章

“南澳 I 号”明代古沉船

- 一、“南澳 I 号”的构成及保存状况 / 092
- 二、历史沿革 / 093
- 三、“南澳 I 号”船载金属原材料与装载方式 / 094
- 四、“南澳 I 号”出水文物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 / 095
- 五、明代后期“隆庆开禁”与“南澳 I 号”沉船瓷器主产地 / 100
- 六、“南澳 I 号”发现的价值 / 104
- 七、“南澳 I 号”的影响 / 108
- 八、“南澳 I 号”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 111

第五章

南澳建牙设镇和海上贸易的发展

- 一、南澳总镇设立，成商旅坦途 / 116
- 二、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在东南沿海的贸易 / 134

- 三、明清时期南方航线上的“中途岛” / 150
- 四、南澳民俗传统的海洋文明交流 / 154
- 五、南澳民间舞蹈车鼓舞与闽台的关系 / 180
- 六、天主教、基督教在南澳的传播 / 184
- 七、从西方国家收藏的更路簿、中国航海图及绘制的地图看南澳 / 1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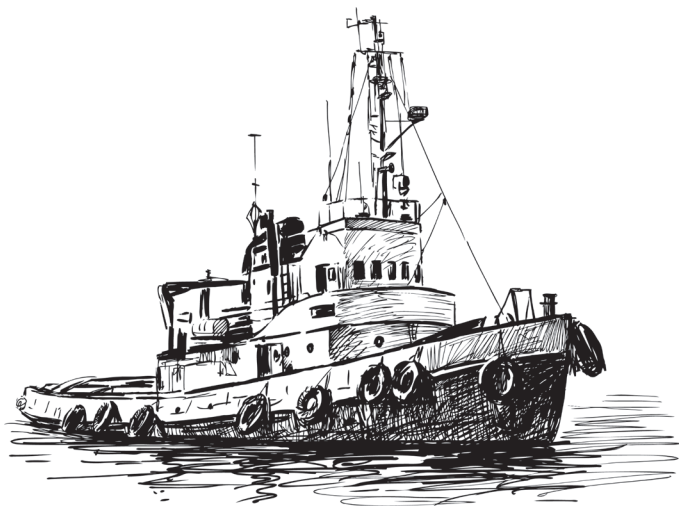
第六章

近当代的南澳港

- 一、近代的南澳港，一个鸦片走私与掠运华工的没落码头 / 196
- 二、清末至民国时期水运工具、水运业务 / 207
- 三、民国时期对外贸易 / 207
- 四、民国时期南澳对台贸易 / 207
- 五、当代南澳，中华海洋文明复兴之港 / 209

后 记 / 220

· 第一章 ·



南澳地理环境与先秦时期
居民海上活动

一、南澳地理环境

南澳岛地处闽、粤、台三省交界地。处于广东省东部海面上，是广东省最大的海岛，位于东经 $116^{\circ} 53' \sim 117^{\circ} 19'$ ，北纬 $23^{\circ} 11' \sim 23^{\circ} 23'$ ，北回归线横贯其中。东至破涌礁，南达南太礁，西与澄海区相邻（以凤屿与澄海五屿海域中流分界），北靠饶平县，面积109平方公里，连同周围23个岛屿总面积为112平方公里，人口70352人，是广东省唯一海岛县。南澳岛除了少量冲积平原外，多为山地、丘陵。被誉为汕头第一峰的南澳岛最高峰——高嶂崇，海拔587米，屹立于南澳西半岛。

南澳岛处在台湾海峡喇叭口位置，因而南澳岛既是海洋性气候，又受南亚热带季风影响。常年气候温和，年平均气温 21.5°C 。夏无酷暑，冬少霜冻。每年夏季至秋季多台风，平均每年受台风影响5~6次。

南澳岛海域广阔，海岛有众多的滩头和港湾。历史上南澳岛就是“耕三渔七”，渔场、气候条件优良；岛上群峦起伏，山地多耕地少，丘陵、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93.6%。主岛海岸线99.22公里，海滩面积0.4万亩，浅海面积24.85万亩。从地质构造上讲，南澳岛位于新华夏系第二隆起带与第一沉降带接壤处，即台湾海峡与陆地交界部位，断裂构造明显，是欧亚板块与太平洋板块运动的产物。

（1）岛内存在新华夏系和一部分东西向构造系两种构造体系。

（2）南澳断裂带呈北东向，南起惠来县靖海、经南澳岛至福建省的东山、厦门、长乐至浙江省沿海，全长500公里，呈北东 45° 左右展布，略向东南凸出，大体上与海岸线及20米等深线一致。南澳岛处于断裂带南东侧，岛南东侧的后宅前江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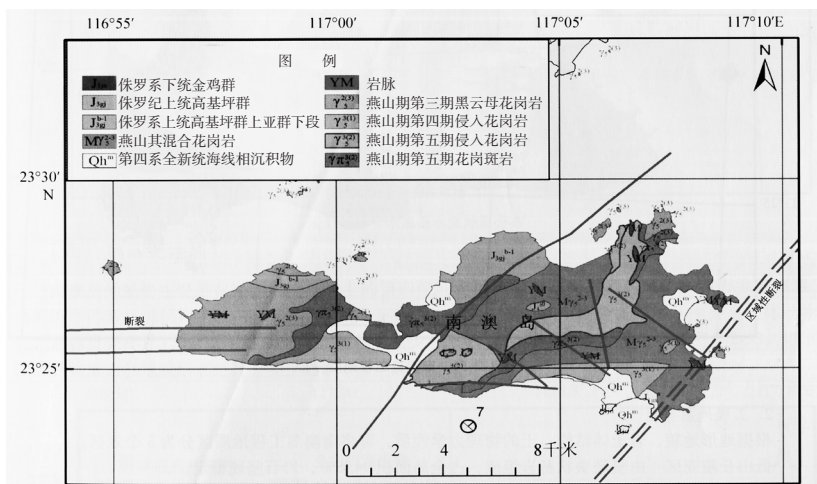
海边“宋井”

云澳镇一带下沉，近岸水平阶地明显，云澳镇澳前村海边的“宋井”，现已接近没于海中。估计此处每年以2~4毫米的速度发生沉降。1987年《广东省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报告》记录：“据访问资料，南澳镇1918年大地震之前，南面有宽阔海滩，可搭台唱戏，其上有水井（宋皇井），深入海底1~2米。”

（3）南澳岛处于新华夏系第二复式隆起的东南侧与南岭东西复杂的构造带南端的交接带，构造形迹以断裂为主。岛内见有两条北东向断裂，均为活动断裂。虾公尾—猎屿断裂带斜贯南澳东半岛，两端伸入海中，长10多千米，后宅至果老山一带，具有较强烈的硅化，果老山至猎屿一带则主要为片理化。圆屿断裂带见于南澳东南部的东南端，两端延伸入海，长3千米以上，主要表现为片理化夹带糜棱岩条带，宽度大于1.5千米。

（4）南澎列岛断裂带，在南澎列岛的东南侧海域，是泉州—汕头断裂、处于太平洋板块与亚欧板块的俯冲部位，地壳不稳定。南澳岛地质发育于中生代侏罗系（距今1.95亿年），新生代第四系（距今250万年至1万年）的陆相沉积、海相沉积和风积等。

①陆相沉积分为残积、坡积以及残积—坡积、洪积—冲积。残积覆盖占



南澳岛区域地质与构造示意图

南澳岛第四纪沉积物的50%以上，根据花岗岩风化程度不同分碎屑角砾层、构造残积层和网纹层。洪积—冲积在南澳岛仅有冲沟和小溪，在沟谷出口处分布一些洪积层和冲积层交替的小洪积—冲积扇，沉积物由含细砾的中粗石英砂和黏土组成，构成灰色或灰褐色含细砾的砂质土或亚砂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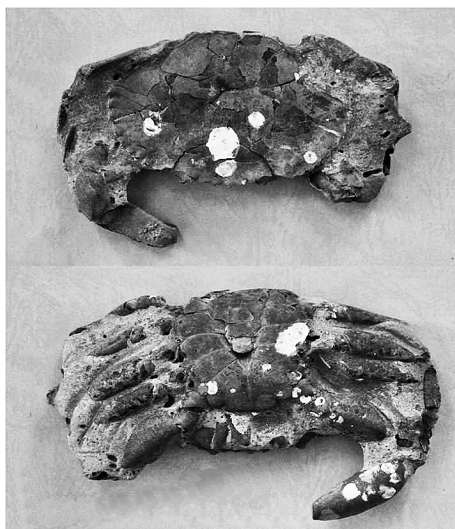
②海相沉积。南澳岛沿岸的海相沉积全为现代滨海沉积，分布零星、覆盖面积不足全岛的10%，沉积物以砾石和砂为主，泥质少。在地貌上组成海滩、海积平原、潟湖、沙嘴、沙堤等。

沙堤堆积分布于青澳、云澳、前江湾等迎东北季风和西南季风的堆积岸段，沙堤高2~5米，宽数十米，堤顶多为风成沙丘。潟湖沉积分布在岛东青澳和南岸云澳的沙堤内侧，沉积物为砂质黏土和黏土质砂（现已成为耕地和民居点）。海积平原沉积分布在深澳湾内和后宅镇北部海湾，曾改造为盐田。



青澳沙堤的风成沙丘

③风积分布在面迎东北、东南和西南季风的砂质海岸，加积在沙堤顶部，或改造海积沙堤，形成一系列风成沙丘带，尤以青澳沙堤的风成沙丘发育较好，最宽达100米，最高达6米（近几年开发房地产沙丘被破坏，在沙丘下面深度约45米处曾钻探出古树木化石）。另一类风积沙堆积在沙质海滩毗连的山坡上，见于云澳镇澳前村“宋井”附近，堆积高



火山岩浆所淹没的螃蟹

程近10米。⁽¹⁾

岩浆活动和火山喷发主要发生于燕山期（分为燕山早期的黑云母花岗岩、细粒花岗岩和燕山晚期的石英斑岩和花岗斑岩），在岛北侧大尖山一带有上侏罗系（距今1.95亿年）的流纹斑岩、凝灰熔岩；在岛的中部葫芦山下有下侏罗系的变质长石石英砂岩夹变石粉构造运动产物。⁽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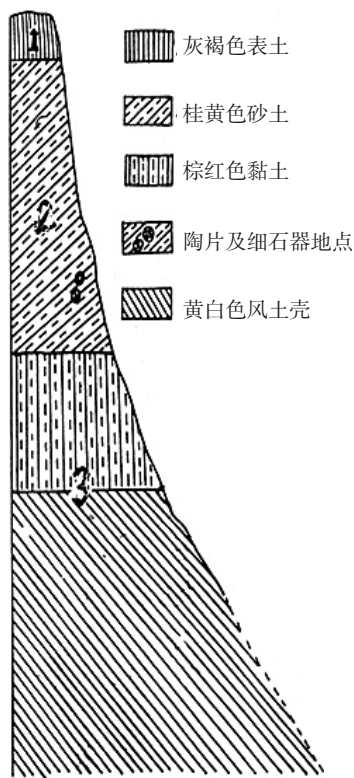
二、南澳与陆岛连桥

随着当代考古发现表明，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南澳已有原住民，其文化内涵虽与粤东、闽南各地文化有差异，存在着明显的独特性，但基本是同一体系的文化系统。为了认清南澳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演化之间的关系，显示南澳文化演进的情况，将以环境演变、考古发现遗物来描述南澳自然环境的状貌。自然环境的演变，对人类社会有着深刻的影响，而在自然演变的过程中，起相关作用的在于人类的生产活动。人类的生产活动，改造了自然地理环境的面貌，促进了人类自然环境的形成。但是要获得这个时期人类活动的可靠文献几乎不可能，只能借助考古发现，从逻辑上推断来描述南澳的演变。



南澳县政府大院外海蚀岩，如今的大海离此处大约2500米之远

据《广东省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报告》，“广东沿海更新世中期以来普遍有过两次海进，第一次在晚更新世中期，海进层14C年代为距今 $38400 \pm 2550 \sim 18330 \pm 610$ 年……当时海平面高程因受后期构造升降的歪曲而不易获得可靠的海平面变化曲线，推测在现今海平面之下10~20米。第二次海进在全新世，海进盛期在中全新世，韩江三角洲可达潮州；榕江可抵揭阳或渔湖；海丰抵梅陇，珠江三角洲至西南镇；广海平原抵冲葵；漠阳江至大山村；南渡江达铁桥”。也就是说，粤闽沿海地区海岸线曾有推进和内缩的变化，在距今10000~8000年海平面出现低于现代海面10~20米，沿海通道变宽阔而平坦，此时许多岛屿都与大陆相连。⁽³⁾据水下考古资料表明：在漳州市晋江县深沪湾发现了大片海底古森林残迹，经鉴定为福建油杉属植物14C年代为距今 7620 ± 130 年；南澳县南澎列岛附近314渔场下新礁海域发现了沉溺滩岩（ $117^{\circ} 09' E$ ， $22^{\circ} 47' N$ ），14C年代为 4180 ± 110 年，4000年前海滩环境，现已落在40米深的海底。⁽⁴⁾因而南澳岛与福建的东山岛、台湾地区等岛屿一样，在距今10000~8000年前后出现陆岛连桥，与内地交通，未有海洋障碍。



象山细小石器遗址地层

今 7620 ± 130 年；南澳县南澎列岛附近314渔场下新礁海域发现了沉溺滩岩（ $117^{\circ} 09' E$ ， $22^{\circ} 47' N$ ），14C年代为 4180 ± 110 年，4000年前海滩环境，现已落在40米深的海底。⁽⁴⁾因而南澳岛与福建的东山岛、台湾地区等岛屿一样，在距今10000~8000年前后出现陆岛连桥，与内地交通，未有海洋障碍。

南澳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与粤东、闽南沿海文化交流显然也与地理环境有关，特别是与闽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交流相对频繁一些，这些我们从象山细小石器遗址遗物得到证明。

1993年发现的象山细小石器遗址位于后宅镇后江港东北部，为东半岛葫芦山系伸向古海湾的西端，海拔高度约30米，遗物多裸露于地表。根据象山断层，地层由上而下可分为四层：第一层表土层，灰褐色，厚20~30厘米。第二层桂黄色砂质土层，黏性



象山遗址出土的细小石器

以“漳州文化”命名的遗址出土的细小石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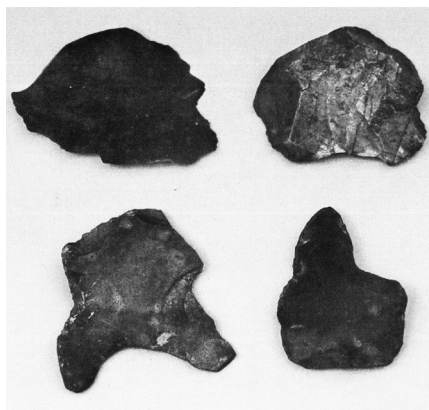
大，有网状结构，夹有少量碎石、砾石，厚170~200厘米，有零星文化遗物分布。在距地表深188厘米深处采集到一件燧石小石器（标本XF19），并在距离小石器约3米远的同一地层、距地表160厘米深处采集到一片黑色夹砂两面纹陶片。第三层黄白色风化壳砂质黏土，厚约300厘米未见底。在有的断面上，风化壳黏土上部有一层厚约100厘米的棕红色黏土。第三层以下为基岩，即为第四层。石器品类有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石钻等，共93件，另有

50余件石片和6件石核。象山细小石器原材料以燧石为主，石英数量少。形体细小，一般长、宽不超过3厘米，多由不规则形薄石片加工制成，也有部分长条形、三角形石片。象山细小石器主要有刮削器和尖状器，其中刮削器的品类和数量最多，占石制品总数的83.8%，有凹刃、凸刃、凹凸刃、直刃、圆头等，其加工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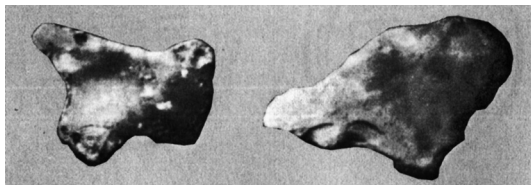
各处发现的小石器

刃有单边、双边、多边。尖头类石制品包括尖状器、雕刻器和石钻。这批石制品无论原料或形制、类型、加工工艺等与福建漳州地区发现的以“漳州文化”命名的细小石器遗址并无二致，同属一个考古学文化。“‘漳州文化’包括漳州市北郊台地的113处地点、平和县的3处地点以及东山县和诏安县的各1处地点，龙岩、厦门等也有发现，总数已达200多处。”⁽⁵⁾ 这批石制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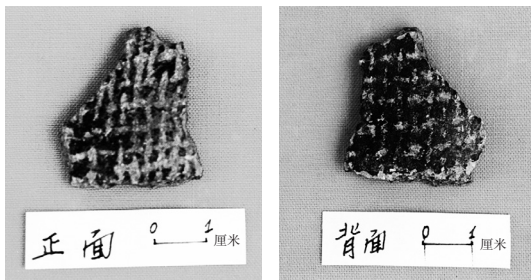


丰顺汤屋山采集的细小石器

特点是：器形普遍细小且薄，类型复杂，加工精细，以石片加工成刮削器、尖状器、镞形器、雕刻器和石钻，以刮削器为主，一般长0.9~2.3厘米，宽度在0.8~2.4厘米之间，石器中经过第二、第三步加工的超过30%。象山细小石器遗址石器的制造工艺以在侧缘打落小石片和进行第二步加工（单向加工为主，也有采用交互打击或错向加工等方法）为特点。石器的制造不注重形态的规范而表现出很大的随意性。通过对石片标本XC82、XC83的电子显微观察，锋利的边缘显示出经过使用的擦痕，该遗址类型缺少一种打制石器的目的行为，器形不讲究加工工艺，充分表现石器的随意性和原始性。特别是标本XC82黑色燧石长石片，横断面呈三角形，背部单脊，腹面平整，“两端整齐，似被有意截去，在‘漳州文化’中，也有长石片标本前端可能是被有意截去，两个锐利的侧缘可直接使用”。遗址器形以山



象山细小石器遗址出土的双面纹陶片



广州南郊番禺飘峰山出土的小石器

字形、人字形及弧背最具特色，典型器物“人字形”凹刃刮削器应是“‘漳州文化’中最具地方特色的凹刃刮器一类器物，而山字形石钻与在‘漳州文化’中被称为三凹缺刮器的FZZ001~005号标本形态、加工方法、使用功能均完全一致”⁽⁶⁾。此外，在南澳岛后宅的金山北侧、吴平寨东侧都有细小石器的发现，2015年7月和2016年12月我们两次对云澳镇烟墩湾做地质调查时也采集了6件与象山细小石器同类的石器，应同属考古文化范畴。在“丰顺汤屋山……发现一种用燧石打制而成的石片石器。多为凹刃刮削器，以人字形最具特色。……这类石器在东邻的福建漳州地区（部分地点亦属古揭阳范围）有较多发现，是属于同一考古文化遗存。其年代在距今13000~8000年之间。在广州南郊的番禺飘峰山也发现两件同类的细小石器，当是其粤东与珠江三角洲地区交往证据”⁽⁷⁾，可能是“漳州文化”的居民顺海岸而到达之所。这些基本上体现了南澳细小石器文化面貌与特色，而且与“漳州文化”基本可以形成一个使用细小石器的史前文化区域。

象山细小石器遗址文化与“漳州文化”的最大区别就是在地层中发现石制品之外有其他文化遗物，为其断代提供实物的依据。在断层处发掘与细小石器共存的夹砂两面纹陶片，陶片面2.5厘米×3厘米，厚0.4厘米，表面饰刻画绳纹，内壁为浅而不连续的压印方格纹，质地粗糙，火候低，疏松易碎。陶片和石器出自同一地层提供了遗物堆积的可靠性，这就说明地表上的石制品原来也是产生于第二层之中，后因地层遭受剥蚀和淋滤才暴露出来散布于地面的。陶片与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桂林甑皮岩洞穴等出土陶片进行比较，其年代在距今8000年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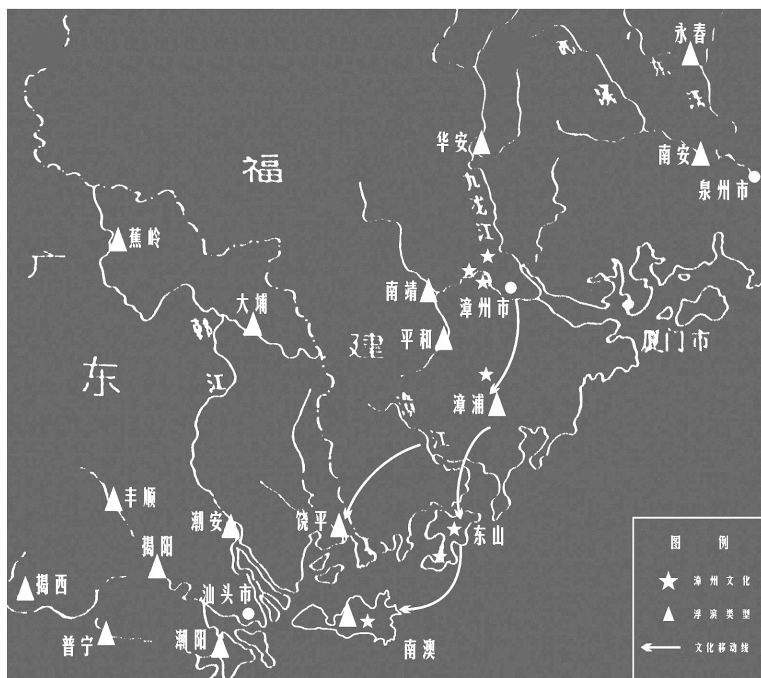
南澳的后宅金山、吴平寨、云澳烟墩湾、丰顺汤屋山、广州南郊的番禺飘峰山这些地区的发现，使南澳象山细小石器的发现不再是孤立的现象。我们可以看到，象山人在古海湾沿岸的丘陵平台上，建立



云澳镇澳前村从宋井景区至烟墩湾2000多米全新世沉积

比较固定的聚居营地，用这些细小石器当工具，在海滩上捕捞采集鱼虾贝类食物，过着一种相当单纯的渔猎生活，通过陆岛连桥与附近先民有着生活、生产来往。

陆岛连桥取决于地理环境变化，主要表现在海岸线变迁。随着冰期之间出现的温暖时期，大量冰融化导致古海面不断升高，在距今5200年出现高于现代海平面的最高海面，今天的潮汕平原在那个时期成海洋底。在潮安庵埠镇牛头山南麓海蚀石、南澳果老山东部海拔440米处的海蚀物，都说明了海岸线的变迁，海侵过后为相应的海退时期，海水的退却在海岸线上留下贝壳堤、牡蛎礁、泥炭岩和海滩岩等。数次海侵对陆岛两岸的影响表现在：大面积的沿海森林和古代居民聚落被海相地层掩覆；陆生类型的植被频繁更替，森林性动物群被迫迁往内陆盆地和丘陵地带。在距今4500~2000年，随着海岸线升降波动，海平面高程与现今不相上下，粤闽沿海的连接通道便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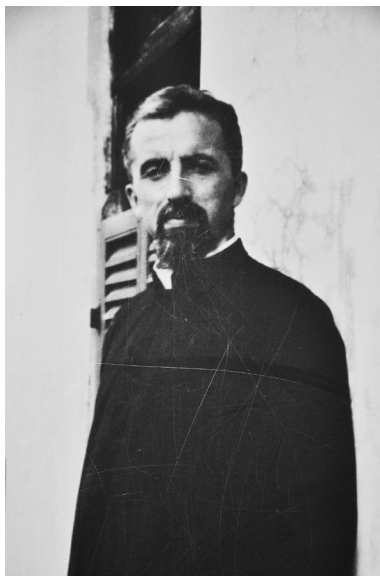
潮汕地区与闽西南史前文化分布交流图

宽变窄，南澳与大陆之间一直被海水分隔至今。值得注意的是，几次较大的海侵，使沿海地区形成少林的丘陵地带，这不可避免地影响活动在这里的新石器时代居民的经济和居住地点，迫使他们重新选择聚落居址，改变食物结构，去追求新的来源，从而发生了文化面貌上的变化。

在地球最后一次冰川期（距今10000~9000年）结束前，南澳为东山、南澎列岛、澎湖列岛至台湾陆桥之中一站，而为台闽粤之交通要冲。通过对10000年前地理环境演变描述及考古发现的比较，诠释了南澳早在8000年以前就有人类聚居。从考古推知他们属于先越系统之土著，“象山人”是这个时期的代用词。从闽南漳州、粤东的南澳和丰顺，并向西传播至广州南郊的番禺飘峰山，可能是人群迁徙，也有可能是文化传送之显现。它显示出在早于浮滨类型、陈桥类型之前，这一块已构成一片细小石器为主的新石器早期文化区域。

三、考古发现印证南澳先民海上活动和海洋文明的兴起

南澳史前人类活动考古取得重大突破是1990年8月30日发现的东坑仔商周遗址。而在此之前，20世纪30年代麦兆良神父已在南澳发现同一时期遗物——鸡形陶壶。2012年3月笔者到香港调查时，在香港历史博物馆第一次看到麦兆良神父在南澳岛发现的鸡形陶壶。麦兆良神父（Fr Rafad Maglioi, 1891—1953）于1928年被米兰宗座外方传教会从意大利委派到香港，再到广东海丰地区（包括汕尾市）一带传教，其间他协助芬戴礼神父（D. J. Finn, S. J. 1886—1936）于海丰地区从事考古调查，对考古产生浓厚兴趣。1934—1946年，麦



麦兆良神父

兆良神父于广东（特别于海陆丰、汕尾、汕头南澳等地）及福建进行广泛的



南澳出土的鸡形陶壶



咸头岭商时期墓葬出土的鸡形陶壶

考古调查，取得大量考古材料，并以此探究华南文化的演进。他更是第一位应用¹⁴C年代测定中国考古研究的学者。他编写的《粤东考古发现》一书中这样描述在南澳的发现：“我在汕头附近的南澳岛上找到一个相当大且状况完好的水罐（高度24厘米，笔者注）。该水罐呈红色，焙烧火候甚好，整个水罐都饰以拍印网纹饰，并有黄色釉遗痕。在发现它时，这个水罐埋在海岸沙丘里，但沙丘并没有其他文化遗存，不过在附近的几个小山上却发现另外一些菝子园的文化遗存。这个水罐的发现有一段颇有趣的回忆，记得当时我们在汕头附近的南澳岛上澳头村东面大约500米处的一个铜石并用文化时期的古墓里挖掘时，我挖出了这个水罐。水罐在离地表约1米深的地下，可想而知，这个水罐埋在古墓里颇有些年头了……”这是南澳岛第一次考古发现，其时代为新石器末期，除了南澳之外，“这种形制特殊的陶器在揭阳曲溪五堆、埔田岭后寨、曾宁仙湖水库、饶平深涂顶大埔山等地亦有发现”⁽⁸⁾。这类器物目前所见的地点还有五华华城狮雄山、龙川佗城坑子里，和平肖屋山、揭阳揭东县云路镇及深圳咸头岭中层墓葬，均应系从潮汕经由海路输出。

1990年8月中旬正值广东省“保护文物，人人有责”宣传月在县内开展。笔者当时由于工作关系到广播站，其职工蔡永义（已故）谈到在东坑仔帮助朋友挖土时发现了一些红土烧的中间夹黑的碎“瓦片”和一个像“碗”的东西，这些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详细询问其分布情况。随后，按照他描述

将“碗”形状画草图，发现为陶器盖。8月30日笔者与蔡永义同志到发现点，在坡积面发现大量陶器残片，并对其进行清理、采集。经过一年调查，1991年与中山大学曾骥教授合作在《东南文化》杂志上发表了《广东南澳县东坑仔古遗址》考古报告。南澳东坑仔发现商周时期聚居遗址，打破了史书上记载的宋代才有人类居住的历史，为南澳史学界揭开何时有人类活动生息的秘密。



揭阳揭东县云路镇中夏村出土的鸡形陶壶

东坑仔商周遗址生产工具有石斧、石镞、凹石、石纺轮及陶网坠、陶拍等，依据陶片基本功能看出器型主要有大口尊、罐、豆、壶、支座、器盖等。纹饰有梯格纹、方格纹、双线方格纹、蓝格纹、菱角纹及弦纹。东坑仔遗址器物类似浮滨类型，“而有别于珠江三角洲含几何形印纹陶遗存”⁽⁹⁾，也“不见浮滨类型中流行鸡形壶，在更多特点接近云霄县发现的墓林山类型”⁽¹⁰⁾。在东坑仔遗址调查中，我们曾一次采集到7件陶拍，更进一步证实此地之制陶业有相当规模，有烧造陶器的窑场。石质纺轮的发现，则说明居民懂得制作纺织类衣服。这与粤北地区以及岭北地区传统是相同的。特别是遗址发现大量凹石，所谓凹石，一般又称石锤，是利用天然的砂岩砾石作为石锤使用，是一种贝类食物加工工具，由于长期地敲击各类贝类，在其表面有锤击硬物而留下的多个使用凹痕。其大小不一，形状也变化较大，“在闽台地区凹石数量相当丰富……在台湾省，台北市大坵坑、圆山、桃园县的尖山、苗栗县苑里瓦窑、白沙屯过港、南投县埔心子、高雄市桃子园、凤鼻头、恒春的垦丁、鹅銮鼻等30多处史前遗址皆有出土……”⁽¹¹⁾而在福建地区则集中分布在闽南地区的金门富国墩、云霄墓林山、东



笔者在东坑仔进行调查



东坑仔出土的陶拍



东坑仔出土的纺轮



凹石与贝类堆积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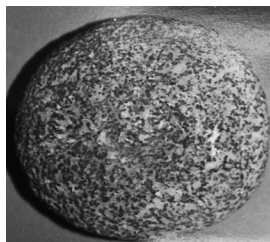


山的大帽山。广东“雷州半岛徐闻县华丰岭海边沙兵遗址，特别在海康县海田乡英楼岭、英利镇的英典北和兰园岭等遗址也发现过许多‘凹石’”⁽¹²⁾。汕头市澄海的鼎脐山也曾出土凹石；在深圳大黄沙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葵涌角山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也都出土有凹石。而东坑仔商周遗址采集的20多件陶支座，造型包括实心体和空心体两种，为夹粗砂红陶，器壁粗厚，敞口，中空，腹壁较直，下端外撇。在揭阳揭东县龙尾镇石榴河遗址、深圳赤石湾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鹤地山商时期遗址、大黄沙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均有出土。我们可以看出先秦时期粤东、闽南地区文化类型是相同或至少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东坑仔遗址虽然是浮滨文化的第一处海岛遗存，但浮滨文化居民的海上活动能力是无可置疑的，珠江口的香港岛屿也发现浮滨文化遗物，就是浮滨文化居民从海路向西迁徙的证据。”⁽¹³⁾它们是浮滨人带去抑或是以商品贸易而出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让我们看到了文化传播与两地文化融合。

除了东坑仔商周遗址外，1994年12月笔者根据村民田清四提供的线索在云澳西畔村委会崩山坡地



深圳葵涌角山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出土的凹石



澄海鼎脐山出土的凹石



深圳大黄沙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出土的凹石

及近海岸海滩（处于隆云公路旁）采集到石镞3件、石斧4件、砍砸器1件以及鹿角1件、鹿牙5颗等遗物。分布面积约1000平方米。从遗物分布情况分析，原遗址应位于今隆云公路、龙珠寺及龙珠寺附近山坡，目前沙滩已建成渔港港区。根据采集器物特征，该遗址年代约在新石器晚期至商时期。

2004年11月27日深澳镇薛友伟工程队在竹栖肚湾建培苗场挖基时发现青铜兵器——钺1件。在调查中也未发现新的遗物。该钺长5.7厘米，刃残宽3.5厘米，柄3.5厘米，厚1.5厘米。为长方釜宽体弧刃式，釜下一凸起弦纹，体部愈往下愈大，刃部宽大呈弧形，刃两侧翘起。它应属于战国时期墓葬冥器的遗物，其形状与揭阳同期遗物相比较刃部弧度较大，形制比较特殊，区域特征比较明显。它是南澳继象山细小石器遗址、东坑仔商周遗址及云澳崩山采集到石斧、石镞和鹿角、鹿牙化石等考古上的又一新发现，填补了南澳没有发现先秦时期墓葬及青铜器遗物的缺环，也将有助于揭示南澳岛新石器时代文化向青铜器文化发展、演变的文明进程。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说，在海岸区域，“大海给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与渺渺无限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自己的无限的时候，他们就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同时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陆陆续续的考古发现，让我们走向浩荡无际大海探寻人类海洋文明，中华海洋文明是原始海洋文化进步的结



东坑仔商周时代晚期遗址出土的陶支座



揭阳揭东县龙尾镇石榴坳遗址出土的陶支座



鹤地山商时期遗址出土的陶支座



云澳崩山遗址采集遗物



青铜钺

果，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南澳与相邻先民们或许是开发海上航路的先驱，是粤东、闽西南海上贸易的最早一批开拓者；或许是粤东、闽南地区进入海洋文明时代的一种标志。

注：

(1) 文中资料参阅《南澳县志(1979—2000)》《中国海岛志》《潮汕自然地理》。

(2) 文中资料参阅《南澳县志(1979—2000)》《中国海岛志》《潮汕自然地理》。

(3) 《粤东、闽南史前文化区域》，《汕头文史》1994年第1期。

(4) 《关于“沉东京”传说的史学、社会学和地学的综合考辨》，《泉州文史》1989年第10期。

(5) 尤玉柱：《漳州史前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

(6) 《粤东、闽南史前文化区域》，《汕头文史》1994年第1期。

(7) 《揭阳的远古与文明——榕江先秦两汉考古图谱》。

(8) 曾骐：《韩江流域史前考古与潮汕文化源》，《潮学研究》1994年第1辑。

(9) 曾骐、黄迎涛：《广东南澳县东坑仔古遗址》，《东南文化》1991

年第6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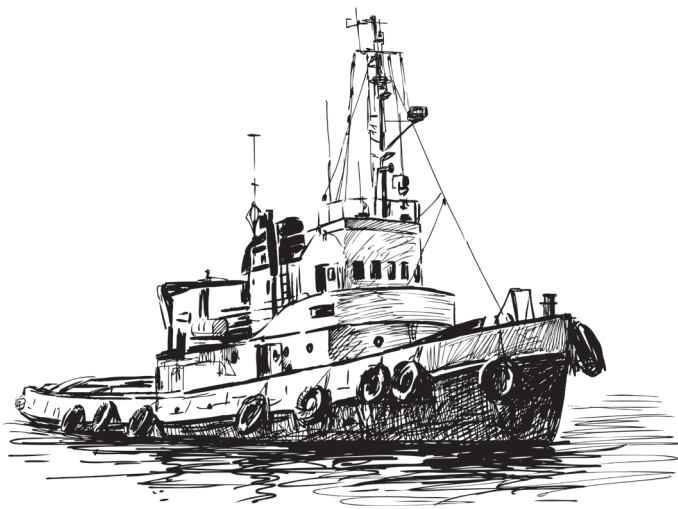
(10) 曾骥、黄迎涛：《广东南澳县东坑仔古遗址》，《东南文化》1991年第6期。

(11) 郑辉：《闽南凹石初探》，《福建文博》1990年特刊。

(12) 杨式挺：《试论闽台粤先秦考古学文化关系》，《福建文博》1990年特刊。

(13) 邱立诚：《再论浮滨文化》，《粤地考古求索——邱立诚论文选集》。

· 第二章 ·



秦汉与宋元时期南澳海上贸易

前面第一章中，已经把南澳考古文化类型与粤闽地区文化做了横向比较，力图通过比较探寻南澳与周边地域文化的联系，确认其独特的文化风貌。

一、秦汉和唐五代时期南澳岛航海地位已见端倪

秦统一和秦戍五岭，秦军是否进入潮汕地区从《史记》《淮南子》未能得到明确的答案，至今依然众说纷纭。在考古方面，也还没有十分可靠的材料可以证明秦人到过此区。

秦末汉初南越国自立于五岭之南，在南海郡设揭阳县，从此该区有了行政建置，但有关这一阶段历史文献资料依然不多。《汉书》卷九十五《西南夷两粤朝鲜列传》：“（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南粤反，余善上书请以卒八千，从楼船击吕嘉等。兵至揭阳，以海风波为解，不行，持两端，阴使南粤。”这是潮汕地区最直接的记载。明万历二年（1574），陈天资所著《东里志》卷二《境事志》考证曰：“此兵船航海之始也。舟至揭阳，则南澳乃东越适揭（阳）之孔道，风一航径东里矣。”

在人的各种活动中，再没有比渡海更具有人类特质的了。在人类原始时期，有一群人试图往海的另一边寻找新的天地，认为在海彼岸有一理想世界，但驱使大量的人航海的最大动机是交易。在尚未有价格可以衡量或表示物品价值的年代，交易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用武力袭击对方或征服对方来抢夺值钱的东西。正如明人费信在《星槎胜览》中说：“自东吴海堧开般，历广闽诸岛。”这是大陆王朝认识海洋，寻探海疆、海岛之始。隋大业三年（607），“帝令羽骑尉朱宽入海访求异物，海师何蛮言春秋之时，东望有异气数千里，因与俱往琉球慰抚之，凡再往还不从”^{（1）}。于是，决定兴兵东征，六年二月，武贲郎将陈稜“与朝请大夫张镇周发东阳兵万余人，自义安泛海击琉球国”。“琉球人见船舰，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稜率众登岸，遣镇周为先锋。”^{（2）}从这条记录可知隋朝时在义安地区经常有商船前往

琉球贸易。自义安击琉球也因义安人习熟航道缘故。明万历二年（1574）陈天资所著《东里志》卷二《境事志》在叙述陈稜破琉球事后论按曰：

“此我师捷获外国之始也。然富商得以逡巡海道，与夷人交通，夷人亦得扬航万里，与中国关市，皆自兹役之起也。其云自义安浮海，则必维舟岛屿，（南澳）隆、深、云、青四澳皆所经历矣。”书中又还记录了唐德宗

贞元十二年（796）漳州刺史陈谟从率兵漳州来揭阳讨贼蓝老鸱。南澳既为峙漳潮大海之天然关锁，历代兵船平寇于潮汕者，不论来自广州、漳州、福州、泉州，南澳孔道为必经者，南澳已为国际航线要冲。

南澳海运贸易悠久，据《马来西亚之发展史》称，唐时已有“巨舶往业海上，运载土货至广州及闽、浙，或远达南洋、日本，转贩外货输入”。说明在唐时，南澳已建立海外贸易关系了。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南澳同知齐翀《南澳志》载：“漳潮无宁宇，寇乱较唐宋元为尤烈。”安乐博教授（澳门大学）在《中国南方的海盗活动及影子经济（1780—1810年）》中更直接指出：“南澳在广东省东边……据文献记载，从唐开始，它就已是海盗的啸聚之处。”唐高宗总章二年（669）泉潮间“蛮獠啸乱”。高宗诏令陈政为岭南行军总管，“率府兵3600名……前往七闽百粤交界之绥安地方相视山源，开屯建堡，靖寇患于炎荒，奠皇恩于绝域”⁽³⁾。永隆二年（681）岭



隆澳山顶村圣王庙



唐越窑玉璧底碗

南蛮獠再乱，继承父职的陈元光提兵入潮州，破营垒，抚慰边民，泉州）、潮（州）始得安定。“垂拱二年（686）乙酉，诏陈元光以玉钤卫左郎将为漳州刺史，得专制境内。于是，劝课农田，惠通

商。”⁽⁴⁾陈元光（657—711），字廷炬，号龙湖，祖籍河东人（今山西与河北交界处）。著有《吉光集》《玉铃记》《龙湖集》，现只有《龙湖集》传于世。景云二年（711），陈元光在一次平定蛮寇在潮州作乱的战斗中牺牲，被封为“豹韬卫镇军大将军”，诏命立庙。宋绍兴十三年（1143），又追封为“开漳圣王”。漳潮百姓为了纪念他，纷纷立庙建祠。圣王庙主要集中于漳、潮、台一带。潮汕地区仅有三座“圣王祠”，一在饶平境内，而弹丸之岛南澳，在隆澳山顶村、云澳镇南台村就各有一座“圣王庙”。足见南澳与闽南文化交流之频繁，以及闽文化向南澳传播之迅速。



南澳部分唐代瓷片

随着当代考古的发展，在隆澳、深澳、云澳地区以及烟墩湾、太子楼遗址附近，我们曾采集或发掘出土唐代瓷器残片。它们让我们看到南澳唐代时就有人类定居的端倪。南澳县博物馆收藏一件于云澳官屿附近海域出水的唐越窑玉壁底碗，该碗高3.7厘米，口径14.5厘米，碗壁略呈斜直，圈足极宽大，似玉壁状，中有脐。玉壁底碗是唐代典型器物之一。在开罗南郊“福建塔特出土的越窑青瓷……”“素釉玉壁底碗为晚唐时期”⁽⁵⁾。《全唐文·进岭南王馆市舶使院图表》也记载了唐德宗时期潮州已有“波斯。古逻本国三舶顺风而至”从事贸易活动。五代时，王审知在福建建立闽国小政权时，也曾“招徕海中蛮夷商贾”，鼓励闽人对外贸易，“泛粤以转市于夷”⁽⁶⁾。宋代以前这段时间，有关南澳的记载几乎是空白。上述许多材料都没有明确提到南澳岛，我们说秦至唐五代时闽粤船舶应经过南澳，仅为推测；然而，从中国海洋交通航路考察，由闽入粤或自粤返闽航程，或者由东南沿海要往南洋一带国家，南澳为必经之地。或因当时南澳未有定名，故未提及。

二、宋元时期东南地区重要港口——南澳

宋元两代是我国海上贸易和海上交通蓬勃发展时期，在我国航海史上占有继往开来划时代的重要地位，“龙泉窑、景德镇窑、德化窑、泉州窑、西村窑和潮州窑是主要外销窑口”⁽⁷⁾。据考古资料表明，在“马来西亚的沙捞越河三角洲的圣土帮及附近的桑吉布亚、桑吉加昂和尼亚大窑周围，发掘很多福建德化、泉州、广东潮安、广州西村的青白瓷”⁽⁸⁾。在阿拉伯半岛“苏哈尔出土有……广州、西村窑和潮州窑瓷”⁽⁹⁾。《宋史·三佛齐传》载：太平兴国五年（980）其王夏池遣使茶龙眉来，是年，潮州言，三佛齐国（今苏门答腊巨港）蕃商李甫海乘舶船载香药、犀角、象牙至海口，会风势不便，飘船六十日至潮州……宋代潮人与海外直接通商虽然未得到官方的认可，但通航之路却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元人汪大渊《岛夷志略》中记录之航线：“石塘之骨，由潮州而生。遥远如长蛇，横亘海中，越海诸国。俗云万里石塘。……脉至爪哇，一脉至浔泥及古里地闷，一脉至西洋遐昆仑之地。”这就是当时潮州至西洋的通航路线。据笔者推测，这条航线应是宋时潮人走私潮州窑产品到东南亚而形成的。在海上陶瓷市场的吸引和推动下，潮州笔架山窑陶瓷业迅速发展，成为广东重要陶瓷产地，其产品最受欢迎，出口量相当大，影响较广，在潮州窑出土的高鼻卷发洋人头像和一批西洋狗图案陶瓷，正是中国外销瓷器非常突出的代表。为了满足对外贸易的需要，“在韩江下游流经的地方洋岗……揭阳新亨镇……潮州的凤山、赤岭、澄海莲下的缶灶山”⁽¹⁰⁾也都有宋代陶瓷生产基地，这些不但反映了当时潮州地区经济繁荣，而且反映了潮汕地区海上交通和海上贸易也蓬勃发展，许多瓷器从潮汕地区通过海上输往世界各国。而南澳处于潮州口岸必经之跳板，自隋唐以来，历代居民亦借“密迩番洋，往来交易，事易流传”⁽¹¹⁾，并利用岛势“盘错溪山，土膏水煖，可以屯商民贸迁类多奇货，几闽船入广，广船入闽，皆不能外南澳”⁽¹²⁾之地位与条件，率致“殷富”。因其昌盛，佛教也传入南澳，云澳三宝寺在“东山巔南向，建自宋代，为一方大道场”⁽¹³⁾，六朝隋唐时代的佛教是为了维护国家为最高目的，或者说为了国家存在的。与此不

同，经五代到宋朝以后，佛教对象扩大至普通百姓，逐渐变化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而存在的佛教，它说明南澳佛教寺院的社会影响还是非常大的。而另一普通百姓崇拜祭祀的对象——妈祖也同时在南澳出现。《东里志》中也记载：在深澳（天后宫）宋时番舶建……它说明南澳岛是宋时福建海商对外贸易船只的停靠点，在他们出洋往来必经之地深澳建妈祖庙。“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海寇沈师犯南澳，广东常平提举杨万里合诸郡兵讨平之。”^{〔14〕}各种证据都说明最晚至宋时，南澳已经有村落，随着海运的繁荣，港口贸易的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观念改变，给这蛮荒之岛带来中原的文化气息。与此同时，外来商人纷纷上岛，使这里的人们接触外来文化，从而改变居民落后的习俗，带来了宗教活动的频繁和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文化交流。

2006年12月对隆澳地区宫前村进行调查时，在村龟山南侧发现了几段瓜楞式柱子，并且其中一段上面铭刻：“钱壹□”，字体为正书。每字为9厘米。柱径为40厘米，倒扑于地。根据柱的形制，断为宋代石刻，为捐捨银两建庵的记载。通过对周边群众的走访，这里的村民称为“渡头庵”。据民国三十四年（1945）陈梅湖《南澳县志》卷十二《祀典》、卷十九《金石》记载：“大井庵在隆澳宫前乡小山岗，传未创乡前已有此庵，因久废佚其名，庵旁有古井一口，故后人以大井名之，今井已湮，尚存残断柱楚及石狮子委于路之两旁，柱大几合抱，一刻‘□□□许廷寔□捨钱叁贯入宝殿修造’，一刻‘信人陈宁捨钱七贯造’，此外断柱刻字尚有多段。”题刻捨钱情况反映了当年南澳的富殷，也是南澳有商贸活动的证据。在西山大潭也有与大井庵石刻性质一样的摩崖石刻，为商人或海船人所捐舍的善举，反映了南澳宋时社会政治、经济、贸易活动。

南澳西山大潭东侧海边摩崖石刻也反映了宋代来往船只或是在南澳停靠，或以南澳为再出发之地。该石刻为二次镌刻，内容为：“女弟子欧／七媛捨井／一口乞平安／匠李一／癸巳十一月记。弟子欧七媛同／夫黄远捨井二口／乙未政和五年”。这与潮州开元寺“静乐禅寺”政和四年（1114）钟款“白瓷窑弟子刘满……舍钱……祈平安”情形是相同的。这是篆记人捐款于宗教的一种活动，同时亦显示宋人乐舍银两祈求神佛保佑平安的心态。当

年位于潮州笔架山窑的瓷器大量外销，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其时韩江出海口当是海船穿梭往来，潮州港帆樯林立。南澳岛位于韩江出海口外，是海船进出韩江的必经之地，靠泊南澳岛之船当亦不少，故而淡水需求必不可少。大潭的“捨（舍）井”石刻，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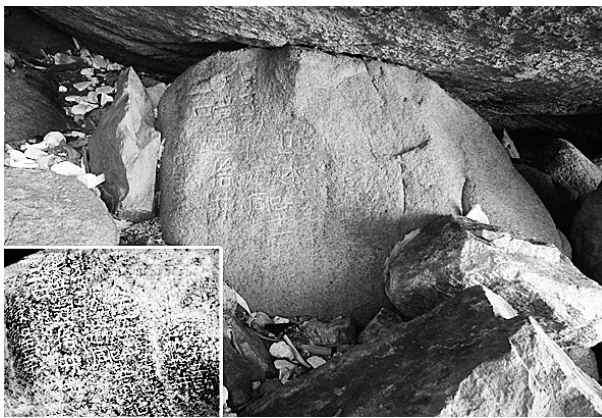
欧氏可能是出海商人，两次行经南澳靠泊，都捐舍挖井以行善举。虽目前还无法探明这几口“捨井”的具体位置，但从石刻内容判断，可知当年在岛上挖井求水并不是一件小事，值得刻石以表其志。其虔诚的心态与大井庵捐舍银两建庵寺心态何其相似。由此推断，欧氏本身也是海船上的人，深知淡水对航海人特别是远航的船只更重要。故而在政和三年（1113）第一次“捨井一口”后，仅相隔一年出海船经南澳取水补给时，又有第二次“捨井二口”。或许她是为自己有了第一次的“捨井”善举，因而出海平安归来而感触吧，所以第二次较第一次更加慷慨和虔诚，所镌刻字体亦更大，并将其丈夫“黄远”亦“榜上留名”，它应该是欧七媛当时心理状态的写照，正是出海人祈求出海平安的心态，也是出海商人停泊南澳的生动写照。客观上也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



大井庵遗址



大井庵石刻



大潭石刻

经济活动，尤为可贵的是提供了当年有关对外贸易的一些线索。它是南澳迄今最早的摩崖石刻，在南澳县现存石刻中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是宋代从事海上往来贸易的商人捐舍善举之风的体现。

除了大潭之井和前述宫前大井庵旁古井之外，据史书所载宋代南澳所挖之井还有：

镇福井在深澳，相传宋代已有此井。

井子澳古井，在隆澳，水甘美，宋帝昞至井澳即此。

高厝井在云澳，宋代有此井。

太子楼井（即今宋井）在云澳太子楼山麓，距海约十丈，清光绪十五年（1889）发现，其水甚甘，近复为潮汐淹没。^{〔15〕}



《永乐大典》卷5343《潮州府（一）》卷首潮州“地里图”

南澳这些宋井，分别反映出各自所处不同历史背景，尤其是大潭的“捨井”石刻，反映宋代海贸船停泊南澳，或以南澳为出发港的一段历史，该石刻与出海贸易的漳、潮商人有密切关系，对于研究潮（州）、漳（州）人商贸活动和南澳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潮汕交通史具有较高的价值。是南澳为海上丝绸之路中转站及商贸必由之路的实物例证，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史迹之一。

明《永乐大典》卷5343《潮州府（一）》“地里图”在潮州东南方海上岛屿上已标有“南澳”地名，这当是原宋元潮州方志《三阳志》卷首之附图，虽然不能确定地名形成的具体年代，但可以肯定不会晚于元末，南澳就有定名了。南宋绍定五年（1232）八月任泉州知州的真德秀所撰公文《申尚书省乞措置收捕海盗》让我们钩沉南澳宋代史事之一斑。现全文抄录如下：

当州五月十五日承潮州公状：证会四月三十日据水军寨及小江巡检司中，贼船复在大坭海，劫掠漳州陈使头过番船货，掳去水手纲首九十一人使（驶）回深澳抛泊，出没行劫因依。当具申本路经略安抚使司及移文漳州，乞发兵船前来，会合沿海驻扎官军船只，并力收捕。至五月初四日，又据小江巡检状：缴到东界、新埭、柘林部长林四等状，称四月二十四日早暮被贼船一十馀（余）只，乘载五六百人，持枪仗上岸劫掠，复使船到柘林澳，掳去盐纲船二只。目今见在深澳抛泊，出没行劫。及据水军统领关承信、副统辖高进义申，称本军发遣训练官钟明、管押先锋船一只，在彼同巡探。见得上件贼船有一十二只，抛泊深澳。本军初四日使兵船出赖巫洋探伺，至洋心，偶见一贼船只从东洋使（驶）入，内二只迫近本军兵船，当开弓弩箭射，射其大口，贼船前来围裹。本军为见军寡贼众，恐失事机，抵（只）得驾船使回，把截本港。目今贼船随后赶来，抛泊吴田澳，与本军人船对望。缘诸州兵船未到，事势紧急，申乞措置讨捕。本州窃见南风正时，所有海贼船只递年往来漳、潮、惠州界上冲要海门，劫掠地岸人家粮食，需索羊洒，专俟番船到来，拦截行劫。今来贼船已有一十二只，其徒日繁，于番船实关利害。除已再帖水军关承信、吴进义、小江巡检及沿海隅总等人，整备器甲人船，严行把截，仍申福建提舶司证会，疾速区处，调遣兵船会合外，申乞

差发兵船前来本州海次会合收捕，庶使海道肃清，番船无阻。及承漳州公文，大意一同州司。证得贼船见泊深澳，正属广东分界，正南北咽喉之地，其意欲劫米船以丰其食，劫番船以厚其财，掳丁壮、掳舟船以益张其势，用意叵测，为谋不藏，此猾贼之所为，非复寻常小窃之比。且自今年二月料罗之败，只有五船，今又添至十二只，闻其贼众已近千人，若容养不除，声势日炽，未易剪灭。兼福、兴、漳、泉四郡全靠广米以给民食，而福建提舶司正仰番船及海南船之来以供国课，今这贼船所梗，切实利害。本州不敢以闽广异路为限，即欲与漳、潮二郡协力讨捕。而南风正时，海道不顺，兼贼势颇盛，所当审图，未敢轻举。已移潮州，请亟告广东帅司，多发摧锋水军前来剿捕，而本州亦发左翼水军与会合，彼此协力，腹背交攻，庶几必捷。欲望朝廷，亟赐札下广东帅司，调发上项水军，使之顺风直上，径袭其后，而本州合军民船并，相为犄角，决可禽（擒）灭贼徒，肃清海道。除已牒左翼军差拨兵船及行下晋安、同安县，劝谕民船并沿海巡尉差兵船前去漳、潮界首会合外，右伏乞指挥，札下广东帅司，调发摧锋水军，与本州左翼军及诸澳民船会合掩捕，仍乞行下福州、兴化军，各发水军，相为应援，庶免误事。申闻。

札下广东略安抚司，证所申事理，立便调遣水军官兵，乘驾船只，多带器械，审探贼徒所在，与本州已调军民克期会合，首尾援应，并力擒讨，须使贼舟窜逸无所，日下尽数败获，海道早肃清。毋得玩纵，滋长贼奸。并札福建安抚司。⁽¹⁶⁾

真德秀的公文佐证了南澳深澳天后宫、宫前村大井庵、云盖寺以及大潭石刻存在的历史背景，也反映了南澳与周边沿海地区的联系，宋代之时东南海上交通繁荣，南澳是航道上的望山，又有井泉、港湾可泊，可补给淡水，是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更重要的是反映了深澳不仅是宋元时期闽粤重要的内外贸易港口，亦是影响闽粤海道安全军事战略的要地。文中提及泊于深澳的“贼船一十馀（余）只，乘载五六百人”，在“料罗之败，只有五船，今又添至十二只，闻其贼众已近千人”，这些让我们看到当年南澳为

海盗聚集之地，并且海盗数目规模庞大，发展迅速，活动猖獗。其所劫掠过往外销船，当包括官方及民间对外贸易商船，不仅洗劫财物，还吸纳水手、商船扩大自己的势力。由于南澳特殊的地理位置，行政军事管理上难分彼此，“本州不敢以闽广异路为限，即欲与漳、潮二郡协力讨捕”，使得闽粤两地不得联合守卫。

《宋会要辑稿》也记载了南澳另一处重要航道据点和停泊之地。“隆兴元年（1163）十一月十二日，臣僚言：‘窃见二广及泉、福州多有海贼啸聚，其始皆由居民停藏资给，日月既久，党众渐炽，遂为海道之害。如福州山门、潮州沙尾、惠州潭落、广州大奚山、高州碣州，皆是停贼之所。官兵未至，村民为贼耳目者，往往前期告报，遂至出没不常，无从擒捕。乞行下沿海州县，严行禁止，以五家互相为保，不得停隐贼人及贼船交易。一家有犯，五家均受其罪。所贵海道肃清，免官司追捕之劳。’从之。”

在潮汕地区潮音的“沙”“山”“汕”三字语音相近，故笔者认为，文中提及的“潮州沙尾”当为“长沙尾”或“长沙尾澳”之省称，或为文献脱漏掉“长”字而成了“沙尾”。“长沙尾”即为“长山尾”。“长山尾”也是“隆澳”之地的异称，在岛西部偏北之处。关于“长山尾”为何称之“隆澳”，下一章有关“南澳与南澳港”会涉及，在此不详述之。从上面记录我们可以看到宋代南澳的深澳、长山尾澳已是海贸船舶停泊之地，同时也是海盗猖獗之地。

从真德秀的公文《申尚书省乞措置收捕海盗》和《宋会要辑稿》的记载可知，在宋时由于南澳地处潮漳交界之地，分疆而治已经在缉捕、管理上制约潮漳两府管辖，成为政治统治的中空地带。即使偶有官府对海盗的追捕，也如明人郑若曾所云“广捕急则奔闽，闽捕急则奔广”。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使南澳成了自由贸易和海盗的风水宝地，也成就了南澳岛在中外贸易中的地位。

在《元一统志》载：“小江场，在海阳县苏湾保，所辖龙眼砂栅、南澳东西二栅、大埕栅、大港栅、二面埕栅、柘林栅、官帽栅、白砂路石头栅、黄冈前栅，又领揭阳县莲唐等七栅。”^{（17）}此处说明宋元时期南澳已是一个

重要产盐区。除南澳东西二栅，还有龙眼砂栅。龙眼砂栅即为明代龙眼沙澳，而南澳当是狭义的南澳，即后来所称“云澳”。南澳的深澳、龙眼沙澳及云澳至迟在宋元时期已有居民垦田构室，商业经济均有所发展，岛上居住人口与日俱增，为沟通闽粤贸易的两个重要港口。

三、从出土文物探秘宋代澳前民众生活和民间商贸活动

澳前村，南澳岛最南面的渔村。别名澳仔畔，属云澳镇。北连云澳避风港，东邻烟墩湾，西北距县城（隆澳）8.5公里。明万历三年（1575）南澳镇属福建诏安县，称澳仔乡。1914年属广东，称南澳第三区澳仔乡。1927年属南澳县第二区。1950年后属云澳并改名澳前。如果说最大规模的贸易城市是贸易港，那么村镇就是最小的贸易城市。澳前村这个小镇引起笔者关注不单是因为这里有南宋末代太子驻蹕，更是因为民间的一些发现：

1979年澳前村书记曾米广建房挖基时，曾出土多块石质石板，据他介绍，每块石板长1米，宽0.5米，厚0.07米，都是一面光滑的赤色油麻石，此地正好处于双向街之中，估计是富贵人家的宅地。

1981年2月20日，澳前村民张九洁在金岛地盐埕尾建房挖基时，出土了窖藏28公斤3700余枚铜币，大量宋代铜币，少量唐代、清代铜币。

在澳前村调查走访时，村民都曾提及澳前这一地带叫“金岛地”，从太子楼至原云澳五金厂，有一条“双向街”。1994年笔者开始对其进行调查，在烟墩湾与至宋井区域海边沙堤上面发现大面积宋元时期（少量唐代）瓷片堆积；在村民建民宅挖土地层断面也发（掘）现了宋元时期瓷片、瓦片和生活用品，以碗、壶、碟为主，器表施青釉、酱色釉。瓷片中有龙泉窑、长沙窑、蓝田窑和建窑等遗物。综合两年调查，笔者认为澳前村在宋时应为一个繁荣并且贸易发达的村落，故狭义的“南澳”指“云盖寺澳（或云澳）”（与长山尾称“隆澳”一样下章会有讲述）。而2006年和2013年两次台风过后所出土文物更佐证了澳前村曾是繁荣富殷之村落。

2006年5月18日第1号强台风“珍珠”正面袭击南澳，台风过后，在宋井

亭下面被海浪掏空近1米沙层，发现唐宋铜币近百枚，大部分腐蚀严重或锈结，稍动即碎，无法提取，只有40余枚保存完整，根据不同年号和书体可分辨铜币有：开元通宝、皇宋通宝、嘉祐通宝、熙宁通宝、元祐通宝、圣宋元宝、政和通宝、宣和通宝等，绝大部分是小平钱，少量折二钱。小平钱出土时还有钱币系绳残留。



澳前村位置图



澳前村民张九洁房基出土的窖藏铜币

2013年9月20日第19号强台风“天兔”席卷南澳，整个宋井景区的护栏及防浪堤被摧毁，在沙层下面暴露了大量宋代瓷片、筒瓦、板瓦、方形地板砖等建筑构件和生活用品。在调查时还发现了一个残缺的石臼和莲花形凸雕灵芝纹石磨。石臼风化残缺比较严重。莲花形凸雕灵芝纹石磨，高18厘米，直径23厘米。整体呈莲花状，身饰凸雕灵芝纹，它是宋代用于磨茶之用器。在漫漫千年的中华饮茶文化史上，唐代是我国茶文化的定型时期，唐时的茶事已经成为当时民众生活的一门艺术。陆羽《茶经》介绍的一种茶叶烹煎方法，主要用饼茶，经炙烤、碾罗成末，候汤初沸投末，并加以环搅、沸腾则止。唐宋时代的饮茶，乃茶末与茶汤同

饮，饮后不留余滓（日本抹茶道沿袭至今）。茶艺兴于唐盛于宋，最先流行于福建福州一带。两宋三百年间，社会环境相对稳定，茶叶生产和技术发展较快，品饮方式日趋精致。由于官僚贵族的倡导示范，文人和僧徒的传播，市民阶层的广泛参与，茶叶在生活领域的地位等同于米盐（在潮汕地区至今乃将茶叶称为“茶米”），饮茶在精神文化领域成为一种流行时尚。正如徽



笔者在澳前村烟墩湾采集的部分瓷器残片

宗赵佶《大观茶论》所述：“天下之士，励志清白，竟为闲暇修索之玩，莫



沙层暴露了大量瓷片、筒瓦、板瓦、方形地板砖等建筑构件和生活用品

不碎金锵玉，啜英咀华，较筐篚之精，争鉴裁之妙，虽下士此时，不以蓄茶为羞，可谓盛世之清尚也。”在这普天共饮的社会背景下，宋代茶艺逐渐形成了一套规范程式。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南宋刘松年《撵茶图》描绘了宋人从磨茶到烹点的具体过程、用具和点茶场面。刘松年，生平不详，与李唐、马远、夏圭并称“南宋四大家”，擅长工笔白描。《撵茶图》画面分两部分：画幅左前方一仆役坐矮几上，正在转动茶磨磨茶；石磨旁横放着一把茶帚，是用来扫茶末的。旁边的桌上有筛茶的茶箩、贮茶的茶盒、茶盏、盏

托、茶筴等。另一人正伫立方桌边，左手持茶盏，右手提着汤瓶在大茶瓯中点茶，然后分到桌上小托盏中饮用。他左手桌旁有一风炉，上面正在煮水，右手旁是贮水瓮，上覆荷叶。一切都那么安静、祥和、整洁有序。画面右侧有三人，一僧人伏案执笔，正在作书，一羽客相对而坐，意在观览；另一儒士坐其旁，双手展卷，似在观赏，若有所思，而眼神却在欣赏僧人作书。整个画面给人娴雅生动的



莲花形石磨

感觉，充分展现了宋代文人雅士茶会的风雅之情和高洁志趣，是宋代点茶场景的真实写照。该画意为“围绕茶事内容而作的图”，为我们再现了当时的“茶风”，更让我们如身临其境般看到了“点茶”的具体过程：正在转动石磨碾茶的仆役神态专注，动作舒缓；正欲点茶的仆役右手倾斜汤瓶，欲点茶时的谨慎专注让我们感同身受。另从画中完备的点茶用具可以看出，此时宋代“点茶法”已经形成完整的体系。澳前出土的石磨器型精美，做工细致，应为贵族之家磨茶之用器。它也是宋代茶文化在南澳广泛流行的真实写照。澳前村出土或采集的文物信息透露出这里曾经济繁荣，人口众多，商船接踵而至，因其昌盛，才有三宝寺这样的大道场；才有南宋末代太子在此驻蹕。澳前村是沟通大陆和海外世界重要的枢纽港口。然而，整个村落明代初期是如何消失的无人知晓，志书也无记载，但其港口地位在明清时期益发突出。清嘉庆二年（1797）所立《港规碑记》记载：

云澳耕海作田，船只往还，所以通商贾而广财利。出入必由汛口挂验，历有成规，但日久弊生。乾隆五十五年以来，站口杨常索取无度。嘉庆二年六月，幸逢府尊宪台莅治，四澳沾恩，仁声洋溢。众衿耆暨商渔人等，呈控杨常，蒙堂讯仓口鱼筊，恩免挂号，礼钱恩必合宜。计开条件，勒石以垂久远。观碑思然，亦以杜后日之弊云耳。

一、港单桅船载脯往福建，号艮乙元，钱乙百文。一、龟仔船载脯，号艮式元，钱式百文。一、大船载脯往福建号艮四元。一、本港五块底船载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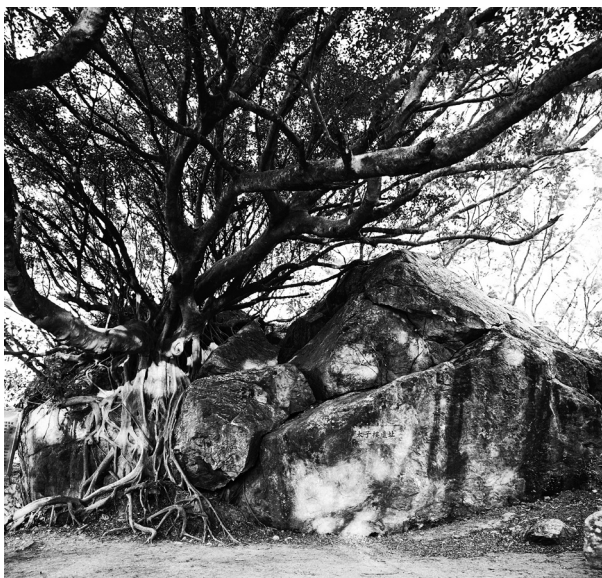
南宋刘松年《撵茶图》

出口号钱三百文。一、本港单桅船出口载扞茅柴筏，号钱乙百五十文。一、云霄船号钱五百五十文。一、澄海船号钱式百文。一、黄冈船号钱三百文。一、诏安大号船号钱七百文。一、外港载米粟入口号钱三百文，本埠按月挂号。一、本港五块底贩艚号钱式百文。一、单桅钓捕渔船号钱四百文。一、五块底小钓船号钱式百文。一、大号罟母小钓船号钱三百文。一、三块底船号钱乙百五十文。一、罟艚号艮乙元钱乙百文。嘉庆二年六月日立。

四、南宋时期南澳与太子楼遗址的考证

南宋末年，国秉飘摇，民心浮动。德祐元年（1275）元蒙大军南下，直逼南宋京都临安（今杭州）。在战场失利、求和不成的情况下，以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等为主的主战派力主朝廷南撤，利用闽广负山临海的有利地势，保宋安民，再图壮举。德祐二年（1276）二月，元军围临安后，一路以骑兵出江西，一路以宋降将范文虎率水军出明州（今宁波）沿海南下，矛头直指闽粤。五月一日赵昱在福州即帝位，称端宗，改元景炎，任张世杰为枢密

副使，陆秀夫为签书枢密院事，册封杨淑妃为太后，同听政，封广王赵昺为卫王。十一月，元兵逼近福州，张世杰、陆秀夫等奉幼帝及卫王赵昺登舟抵泉州港，泉州招抚使蒲寿庚（波斯裔）叛变。二王南航至厦门，在厦门停歇后，二王即由大担岛出港赴潮州，一路宋末幼帝赵昺由张世杰等护卫，从厦门陆路南下潮州，先驻蹕饶平柘林港附近红螺山（南澳管辖范围），并于此处往甲子门。另一路由陆秀夫及卫王赵昺从水路南下入潮，欲往南澳（此时南澳包括潮州府饶平县东南至南澳本岛之间海域）



南澳文物部门根据民间传说所定的太子楼遗址

与宋帝昺会合，因具体地点不明确，辗转至南澳岛之云澳，驻蹕澳前村。据民国三十四年（1945）陈梅湖《南澳县志》卷一八《古迹》载：“太子楼在云澳海崖，叠石为楼。相传宋幼帝驻蹕时所筑，今尚存，旁有指挥甬道，遗址宛然。曰：‘太子者，仍其旧称耳。’谨案：楼非人工所筑，乃巨石生成，高矗平顶，俯临海滨，如罗浮石楼之类。端宗播越海上，驻澳仅逾月，亦非筑楼游观之时，或误与泰字楼为一，盖泰字楼为后建之炮台名。在楼之东偏稍前。近亦拆毁。齐志谓：相传帝昺驻蹕时所筑，但当时帝昺尚为卫王，幸澳为端宗讳昺也，甬道遗址今亦莫可寻矣。”这就是有关太子楼的记载，最早记录太子楼的是明举人永安知县王弼诗：

叠石为楼云与平，楼荒空有石峥嵘。
残基草长阴狐啸，幽壑人称野燐明。
少主羈魂悲海岛，孤臣忠愤殪燕京。
只今楼下潺湲水，似为当年作怨声。

南澳民间也有许多关于宋少帝的传说，20世纪80年代中期县文物部门也根据民间所指的太子楼位置确定为太子楼遗址，而真实的太子楼遗址在哪里？

2004年3月2日南澳旅游部门对宋井景区进行建设时在太子楼遗址南侧约50米发现了古建筑遗物和建筑基址。笔者接报后赶至现场，并采集部分瓦当、筒瓦、方砖、瓷器残片等遗物。初步确定是一处宋代建筑遗迹。3月12日省考古所派郭顺利来南澳对南澳澳前发现的古建筑

遗址进行调查，从建筑规模确定其可能为太子楼遗址。2016年3月、8月，为了配合汕头市南澳县海丝文物古迹考古调查对太子楼遗址进行勘探。

遗址从北朝南，背靠小山丘，东、南、西三面环海。考古队对其重要部分进行了清理。发现遗迹遗存可分两期：一期为宋代时期，二期为明代时期。同时采集到部分建筑构件和大量文化遗物。地层堆积共分两层：一层为灰黑色土，含大量的瓦片和少量瓦当、瓷片等；二层为黄褐色土，含较多的瓦片和少量的瓦当、脊饰、铺地砖、瓷片等。建筑遗迹分主房和偏房。主房呈长方形，进深为三进，三开间。内空西墙残存总长度24.2米，东墙残存长度9.5米。第一进被破坏，进深长度不明；第二进和第一进分界位置被现代雕塑群台基所叠压，其长度也不明；第一进和第二进高低落差根据铺地砖平面测



太子楼遗址平剖面图



第二进残存铺地砖（由南向北）

量，为25厘米。第三进的西面有台阶，以最高台阶为分界，进深内空长度10.27米，第二进和第三进高低落差根据铺地砖平面测量，为48.3厘米。

建筑总内空宽度14.3米。主房建筑以中轴线为分界线，两边完全对称。三开间内空宽度相等，均为4.77米。在东西两间内，分别隔出一间，宽度为1.8米，可能为通道。

偏房位于主房的东面中间位置，北面外墙距离主房北面外墙7.14米。南面由于被现代水泥台所叠压，原有进深不明，东面被现代坑打破，仅见两开间。残存的两面墙内空长分别为2.38米、3.83米。偏房地面低于主房。

根据部分墙基解剖来看，不见有基槽，墙体直接在原生土上砌筑。下部铺石条，石条层次分1~3层不等。石条上用瓦片堆砌，两面都平整，可能是砌筑时采用夹板规范固定，墙宽38~40厘米。残高0~120厘米。内部应为木架结构，泥瓦盖顶。主房横向有一排砖砌成一道单砖墙，东西贯穿，与北墙平行，距其165厘米。

该建筑从西面的第一进位置到东西的偏房北面，被现代坑打破。建筑遗迹中心位置叠压于现代修筑塑像水泥基台之下，此次勘探面积较小，采集信息有限，内部结构情况并不十分清楚。



西侧台阶及铺地砖（由北向南）



第一进只保存小面积铺地砖（由东向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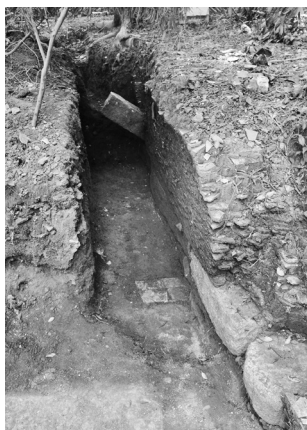


东侧偏房清理后

遗迹内部分地区可见地板砖铺砌，在第一进只保存小面积铺地砖，铺地砖为正方形，泥黄褐色陶，边长28厘米，四面顺墙铺顺铺3排，再成45°斜行错缝排列。

在建筑基址西侧，第二、第三进间，可见台阶。石条铺地砖上起铺，现存三层。第一层石条由两块石条组成，东面被塑像台所压，露出长155厘米、宽27厘米、厚18厘米；第二层石条长145厘米、宽24厘米、厚16.5厘米；第三层石条长116厘米、宽22.5厘米、厚15.5厘米。根据第三进铺地砖平面高度推测其上应还有一层台阶，铺地砖规格形制与第一进所用相同，成45°斜行错缝排列砌法。偏房西间没有找到地面，或已被破坏。东间铺有石板砖，北面部分有一排条砖与北墙平行，相距110厘米，铺成方格形，方格中间没有铺地砖，功能未知。主房的北墙和西墙的第一进位置，各有一个圆柱状柱础，刻有对称四条“瓜棱”槽。其余发现的柱础均为方形，形制相近，分布北墙、西墙以及偏房的中间位置共计5个。

本次勘探发现较多的筒瓦、板瓦、瓦当、条形砖、拱形砖、脊饰等建筑构件，均为泥质陶。也出土有大量碗、盘、碟、盏、罐、砚台等生活用具。其中碗、盘、碟、盏均为青釉瓷，罐、砚台为陶质。铜钱有：元祐通宝（北宋，残，直径2.7厘米）、政和通宝（北宋，完整，直径2.2厘米）、景德通宝（北宋，残，直径2.5厘米）、绍



北墙西侧（由东向西）



太子楼遗址出土的部分瓷器



太子楼遗址出土的建筑构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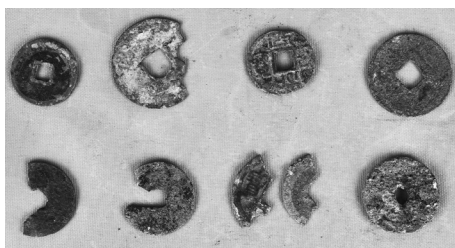
兴通宝（南宋，残，直径3.1厘米）、至大通宝（元，完整，直径2.3厘米）。^{〔18〕}

云澳澳前村发现的大量文物证明，宋元时期这里已经是海上航线重要的停泊点、补给港。在距离建筑东南面约4公里处的三点金半潮礁海域，就是“三点金宋元沉船（2007年5月发现）”“南澳Ⅱ号宋代沉船遗址（2015年6月发现）”“南澳Ⅰ号明代沉船遗址（2007年5月发现）”的发现地点，说明澳前村及整个云澳镇在海上丝绸之路地位突出。从太子楼遗址占地面积较大、建筑结构较为复杂、出土器物较为精美、建筑结构及所出土器物均为生活用器来看，笔者认为，此建筑遗迹应为庵寺或祠堂这一类建筑。也因澳前村当年人口众多，经贸繁华，才有陆秀夫及卫王赵昺停留近一个月。故此建筑应为陆秀夫及卫王赵昺南下入南澳时，将其作为临时

驻跸之“太子楼”。在当时孤悬海中的南澳岛交通不便、建材难以获取的条件下，能有此规模建筑实属不易。此建筑很可能是为来往繁忙的海上贸易提供服务。建筑遗迹约200米处的宋井（即太子楼井），据传为解决南宋皇室驻跸此地时用水问题而挖筑。该井用条石叠砌，呈方形，井面东西0.9米，南北0.89米。现距离海面通常仅10~20米，应该也是海上行船的重要淡水补给点。



砚台



太子楼遗址出土铜币



笔者在太子楼遗址进行考古勘查

五、“沉东京，浮南澳”及“东京路口”的考证

“沉东京（或塌东京），浮（或涨）××”之说在浙、闽、粤民间长期、广泛流传着：在浙江南部有“塌东京，涨绍兴”；在舟山桃花岛（浙江普陀区）有“塌东京，剩桃花”；在福建莆田有“沉东京，浮七州（应为七洲洋）”“沉东京，浮福建”；在福建东山岛有“沉东京，浮大帽山”；在广东南澳有“沉东京，浮南澳”；粤东海陆丰有“沉东京，浮莲花山”等。这些神秘传说影响深远，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未知疑团，像“亚特兰蒂斯”一样神秘。在民国三十一年（1942）陈振藻《东山县志》卷一《地理志·山川》记载：“川陵山，一名苍陵山，又称为苏峰，与揭榜山相接。俗传宋帝昺南渡时，将都南澳，筑此为东京，后地塌陷为海，今城堞尚存。”民国三十四年（1945）陈梅湖《南澳县志》卷二五《丛谈》也记录：“川陵山，在诏安县东海滨半入海。距铜山十里。相传宋少帝南航将都南澳，筑城于山麓，为东京地，竟陷为海，今城堞尚存。俗云‘沉东京，浮南澳’即指此也。”“1986年国家地震局联合科学基金会批准我们（徐起浩、彭承光、王业新、李运贵、冯炎基等人，笔者注）提出的‘闽中、闽南和粤东沿海全新世以来地壳长趋势形变调查及与地震关系——以民间广泛传说沉东京为例’研究课题。”^{（19）}并且形成了由徐起浩执笔的《关于“沉东京”传说的史学、社会学和地学的综合考辨》一文。文中对闽中、闽南和粤东沿海渔民在渔业生产时打捞到所谓“东京城”沉入海底大量陆地废圩进行了调查。

“东京城”沉入海底的大量陆地废圩调查情况表

编号	海域中打捞到废圩渔民			废圩分布范围		废圩特征
	住址	姓名	年龄	海域地名	水深/米	
1	潮阳达濠	杨八	65岁	南澳岛东侧	30~70	似房屋墙的灰段，坚硬，重100多千克，表面粗糙。其中一块灰段有瓦片插在里面，瓦片露出灰段外3厘米，瓦片蓝黑色，约1厘米厚。屋顶角，呈黑色，很硬，碗片

(续表)

编号	海域中打捞到废圩渔民			废圩分布范围		废圩特征
	住址	姓名	年龄	海域地名	水深/米	
2	汕头市 广澳	肖湖	89岁	南澎岛东南 侧, 距南澎 约200海里	40	似三合土墙灰段的 东西, 表面长有 海蚝
3	汕头市 广澳	陈清 美	85岁	南澎东约6 海里	40~50	瓦片, 重达100斤, 似三合土灰墙 硬块
4	汕头市 妈屿岛	石泉	74岁	南澎岛	30~50	瓦筒、黑色, 碎瓦 片, 瓦片插进泥 土里, 露出一侧 呈黑色。有似房 屋三合土灰段的 硬块
5	惠来县 靖海	方娘 卫	62岁	南澎岛东南 海域314渔 场下新礁海 区	40	瓦片, 呈弧形, 比 现今厚, 有的呈 碎片, 砖块变黑。 其他陶片。石头 雕刻的人像, 重 7~8斤, 长约40 厘米, 石狮头, 颈 部被拖网拖断, 重 4~5斤, 砖块长、 宽约8寸(1寸≈ 3.33厘米), 厚约 4厘米。还有房屋 墙灰段一样的硬 块, 呈黑色, 外长 有贝壳
6	南澳县 后宅	黄兆	78岁	南澎岛外中 澎海域	30~40	红色碎砖块, 被黑 色淤泥包裹。铜 钱, 但字迹已模糊
7	南澳县 云澳	戴石 盾	65岁	南澳与南澎 岛之间, 距 南澎岛10海 里海域及南 澎岛东南	20~35	石臼, 呈四方形, 长、宽各70~80 厘米, 可盛4斗米 红瓦片, 长、宽 各约40厘米, 似 三合土的硬块
8	汕头市 妈屿岛	王敬 好	64岁	南澎东外20 海里	30~40	重达200千克, 似 三合土硬块, 还 有瓦片及碎碗片
9	诏安县 赤石湾	刘兴 明	47岁	七星礁南部 海域	30~35	长十几厘米的红色 瓦片及重达30来 斤的似三合土灰 段的硬块, 表面 黑色, 内呈白色, 有碗碎片
10	诏安县 林厝村	林周 成	59岁	南澎岛与东 山岛之间名 叫“东京 嘴”海域	30~40	似三合土地板块 的硬块, 大的100 来斤, 表面平整, 黑色, 厚十几厘 米, 2尺(1尺≈ 33.33厘米)多 长、宽

(续表)

编号	海域中打捞出废圩渔民			废圩分布范围		废圩特征
	住址	姓名	年龄	海域地名	水深/米	
11	东山县 澳角	许春 盛	81岁	东山岛东南 距澳角35公 里海域	40	呈金字形黑色的屋角翘，瓦片，厚 约1厘米
12	东山县 澳角	沈乌 金	60岁	兄弟屿附近 海域	40	屋角翘、红色条砖等
13	晋江县 永宁	当地 渔民		深沪湾海域 及潮间带		红色方砖。古树头
14	惠来县 小岞	当地 渔民		乌丘屿东南 海域	40	碎瓦片，碗片
15	东山县 康美前港	当地 渔民		前港湾海域	6	酷似人工三合土构筑的“城墙”， 当地人称“海底城墙”

通过对民间调查和实地考察，考辨报告得出：“闽中、闽南和粤东一带群众广泛传说的‘沉东京’所在地也正是全新世以来构造运动和地壳长趋势形变较强烈地段，所以该地区不同地方所传‘沉东京’位置也不一样，如广东惠来渔民传说的‘沉东京’位置在汕头海外314渔场下新礁海域，广东汕头、南澳县和福建东山、诏安等县渔民传说的‘沉东京’位置在南澎列岛和兄弟屿附近海域；泉州、晋江县人们传说的‘沉东京’位置在深沪湾海域，惠安、平潭等县渔民则认为‘沉东京’是在乌丘屿附近海域等。”也就是说，东南沿海历史上未有沉没的东京城，后代人由于文化和科学知识的局限，把全新世地壳变化与“沉东京”人为搀合在一起，从语言表层意思去理解“东京”沉浮，而丢掉浮“绍兴”“桃花岛”“七州”“大帽山”“南澳”“莲花山”这一言语的真正含义，曲解“沉东京”真正含义和所指的历史事件。

要破译“沉东京，浮南澳（或浮××）”的蕴义一定要把它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来考察。“沉”非没于水中的“沉”，而应该为沉陷或沦陷之意，延伸为沉陆，即国家沦亡。“浮”也非在水上汛行、漂流之意，而应是

“暂时的，可移动的”⁽²⁰⁾的浮。那么，东京与浙、闽、粤沿海或南澳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东京在哪里？东京城又称汴京，始建于后周显德三年（956）。建隆元年（960）赵匡胤建立宋朝，定都开封，改名东京。东京是国家的象征，也是国家政权的象征。从金兵攻陷东京，宋徽宗与宋钦宗两位宋朝皇帝被作为俘虏押送北上，高宗赵构渡江直到被元朝消灭，实际上迁都于杭州，称临安，但在南宋许多公文或文献都不太愿意将临安称为京都，而用“行朝”“行都”“行在”“行宫”或“行在所”等来称呼，临安也就是临时暂住之意。如：陈白香辑校《潮州三阳志》：南宋时潮州逢“圣元进奉银二百两，赴行在藏西库交纳”。又如《宋史》卷四十五《理宗五》：宝祐五年（1257）诏本府选差武臣迎奉赴在行。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更是直接点明了临安之意，“去年建明堂，今年建太庙，是将临安为久居之地，不得有意中原”。基于这种思想理念的支配下，朝野上下都不愿将临安府杭州称作京都，开封的东京仍然是理念上的首都。而普通百姓心中也是如此认识，如辽宁图书馆收藏的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所刻《抱朴子内篇》卷末刻书牌记：“旧东京大相国寺荣六郎家，见寄临安府中瓦南街东，开印输经史书籍铺。……”⁽²¹⁾上述种种材料证明在整个宋朝历史时期，只有一个首都——东京，其也是国家的象征。“沉东京”实暗喻宋朝已灭亡。

在中国历史上，唯有宋元之交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存在苟延残喘的南宋流亡政权在浙、闽、粤海上辗转奔逃的事实。而浙江沿海另一说法更为完整地证明了宋朝流亡和沿海抗击元军的事实，其谚语云：“沉东京，涨崇明，要还东京地，再过三千年（一说‘两千年’）。”更加完整地表达了保护流亡政权、恢复宋朝的意愿和决心。若把它运用于南澳，就成：“沉东京，浮南澳，要还东京地，再过三千年。”民间通过秘语的形式去传播这信息，告诉我们一段南宋末期沿海抗元恢复宋朝的辉煌历史。虽然历史上没有具体记载稍停南澳时间或其他地区的时间，但沿海这一谚语却揭示了南宋流亡政权短暂驻蹕的地点，因此，“沉东京，浮南澳”其意就是，东京已经沦陷，暂时驻蹕于南澳，其他地区解读也一样，是民间以谚语形式传播着宋朝

君臣南逃的路线。而这条路线也是宋代海上贸易之路。

“沉东京，浮南澳”既然是用谚语形式传达了南宋流亡政权在海上漂泊的历史信息，那么闽粤沿海传说的“东京路口”碑又该如何理解呢？在“闽中、闽南和粤东沿海很多县（市）的人们传说通往东京大路、桥和大路碑，主要分布在广东汕头广澳、饶平县柘林风吹岭、南澳县青澳、福建诏安梅岭南门村、东山县大路口村、官路尾村、苏峰山、兄弟屿；漳浦县古雷、杜浔、大店、深土、后背、晋江县深沪、蚶江、石狮、永宁后杆柄村西青、安海后林村、茵柄村、陈埭下沟村、西滨、沙堤、石圳、泉州后渚、惠安小岞、峰尾等地。传说上述东京路原来多有碑”^{〔22〕}。2010年11月26日，南澳县文化局局长吴占才同志向笔者提供了在布袋澳之前海滨山岗20世纪60年代曾有人亲睹“东京路口”碑。据发现者口述：“我叫余构雍，男，今年65岁。饶平黄冈液压厂退休工人。家住汕头市金平区杏园街21号一座302房。1965年12月入伍，分配在南澳部队通信连。1968年夏七八月份我们架设班8人到云澳熟悉地形。在未到达布袋澳一小路边看到一块小石碑，是人工石。石碑高约45厘米，宽约25厘米。上面刻着‘东京路口’四个字，每字约5厘米见方，石碑距海20~30米，海拔约15米。”12月2日根据吴占才同志提供的线索，笔者与吴占才、吴健勇、吴振喜等博物馆工作人员组成调查组对其进行调查，由于树木茂密，以及开发改变原有山体面貌，寻访石碑无结果。笔者以为“东京路口”碑与“沉东京，浮南澳”是有关联的两件事，可在同一历史背景下来考察。民国三十一年（1942）陈振藻《东山县志》载：“里人朱兆凤望海吊东京遗迹，诗云：‘航海当年计苟安，东京曾筑此江干。孤军竟向鲸波没，绝岛真同蜃市残。城郭只今闻鹤泪，山川何处问龙蟠。那堪回首慈元恨，泪洒崩涛满眼寒。’”这首诗就反映了历代可能多次在海边悼念宋王朝或遗民（臣）凭吊祖先忠魂，所以在他们通往海边路上或海岸边刻下往“东京路口”碑，以示对宋王朝或遗民（臣）永远纪念。元代建立后，对汉族的歧视，更加激起遗民不满新朝统治，尤其是粤东闽南的民众。因此，“东京路口”碑可能设立时间是从元朝开始，其本意是纪念、悼念，让子孙后代永世不忘殉难大海中的祖先。它与“沉东京，浮南澳”一样，也有杀回

东京去的强烈复仇感，是纪念南宋流亡政权的另一种形式。但数代以后，很多人把原来立东京路口碑的本意误解了，把传递信息的“沉东京，浮南澳”本意曲解了，从词汇角度去理解“沉浮”或“浮沉”，将它看作一种表达沧海桑田、人事变迁的变化和浮沉，把它和渔民所见的大海中沉没废圩联系在一起，认为海中废圩就是东京城，其碑是指示通往沉没东京废圩地方的指路碑。

民间谚语有时可能是一种文化再现，也或许是某一历史事件用另一种记录形式进行述说、进行传播。“沉东京，浮南澳”以及“东京路口”碑是考察宋朝社会的语言化石，也是考察宋末动荡社会的特殊窗口。它也让我们了解了当年海上贸易路线。

六、元末“明教”在南澳活动的考证

元朝在潮州建立政权后，认识到南澳重要的战略地位，“曾设兵戍守”，然而“戍兵即据以叛，此御盗生盗也，不如戍柘林，便徙之”⁽²³⁾。这是南澳设兵戍守最早的文字记载，南澳自由商贸的特殊地理位置也已引起了统治者的关注。元朝“经过六七十年的和平发展，进入顺帝至正中期，此区（潮汕地区，笔者注）社会陷入新一轮动荡”⁽²⁴⁾。从三阳兵乱（至正十二年至二十五年，即1352—1365）到元将多里不花（至正十八年，即1358）驻师揭阳被土豪杀害，英勇的潮汕人民从未臣服，一直奋起反抗，兵戎相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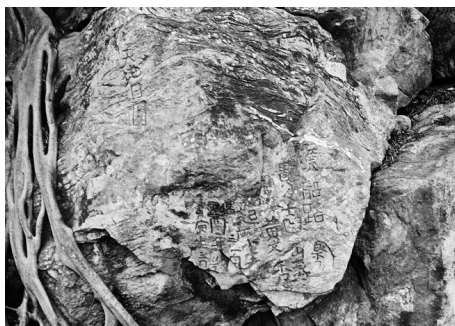
在南澳县云澳镇澳前村宋代太子楼遗址侧畔石壁上有一处100厘米见方、离地100厘米的石刻。“天地日月”在正文上方约40厘米处。因年代久远，石壁剥蚀严重，字迹残缺不全。其内容为：天地日月 / 汉韶路 / 乐（乐） / 贵人士 / □山众 / 黄文秀 / 起□小主 / 广三百 / 丁酉年□ / 壬寅生三月□。据1945年陈梅湖的《南澳县志》载：“太子楼石刻在云澳太子楼右石壁上，字约百余，大径五、六、七寸不等。字行错落，笔画遒劲，似为宋以前所镌。唯剥蚀太甚，只有‘汉龙路乐贵人士山黄文秀起小主广三百丁酉年壬寅生三月’

二十五字约略可辨而已。”在1995年《汕头史志》第二期郭伟川先生的《明鲁王与南澳史事考略——兼论鲁郑之关系》一文中，依据张益欣先生的推断认为该石刻是“郑成功与鲁王在南澳为明朝建基举行三百祭”⁽²⁵⁾。“经纬之言，扶乩之语”“‘天生日月’之假借天意以‘复明’……‘壬寅生三月’亦假借天意的经纬之语，目的为陈豹降清作注脚”是“南澳明史这一历史片断的重要见证”。2005年张益欣先生也在《广东文物》上发表了《南澳“郑成功招水师”文化遗址的发现及其初步探讨》一文，将石刻北侧石壁上自然石纹和风吹雨淋风化剥蚀的石痕，凭借自己的想象与臆断，将其断为“郑成功招水师”四字及一个人物刻像，认为是反清复明的檄文与原来结论相佐证。但笔者多次亲临其地考究、查勘，并未发现北侧石壁有人工凿刻痕迹，经考证，笔者认为石刻应是元末南澳红巾军起义时的石刻，与明教、小明王韩林儿有很大关系。

在元末农民起义红巾军奉的主是小明王——韩林儿（？—1366）。韩林儿是元末红巾军首领韩山童的儿子。元朝统治者的残酷压迫，激起各民族人民强烈反抗。元朝末年，韩山童组织秘密宗教团体——白莲教，联系刘福通利用宗教形式，酝酿大规模的起义，地方官吏发现起义预谋，捕杀韩山童。刘福通继续领导农民在颍州（今安徽阜阳）起义。1355年，刘福通在亳州（今安徽亳县）建立政权，立韩山童儿子韩林儿为小明王，国号宋，年号“龙凤”。

石刻的“天地日月”与小明王是怎样的关系呢？小明王的“明”字怎样的呢？小明王的“明”来源于明教，明教又叫摩尼教，是公元3世纪的时候一个叫作摩尼的波斯人所创立，宣传的是黑暗要被光明战胜，最后，光明战胜了黑暗，众生就脱离苦海。在唐朝武则天授年间传入中国，经历了漫长时间，但一直神神秘秘，因为明教宣传的是“弥勒降生，明王出世”，一些反抗朝廷者经常借助明教来号召民众。因而常常遭到禁止，时而浮出水面，时而潜入地下。为了保护自己，明教还与佛教的白莲宗拉上关系，最后形成白莲教。所以唐朝、宋朝、元朝这些朝代的明教时而浮出水面，时而潜入地下，但长期被用作反抗朝廷的武器。那么，为什么红巾军要奉小明王为主呢？红巾军起义的时候大多数百姓投军的目的都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韩林儿被

刘福通拥立，称其是宋徽宗第八世子孙。而明教宣传的是“弥勒降生，明王出世”，降生以后就给大家带来幸福生活，因而，红巾军把小明王奉为主，为的是“明王出世”，“明王，贤圣之君，光明之义，以有智力摧破一切魔障之威德（《辞海》）”。而这“明”字在中国儒学上是日、是月，在《易·系辞》下：“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中国古代从来都是祭祀日、祭祀月，宣传皇权神授，那就是日、是月。“天地日月”揭示只有一个字“明”，它是明教在南澳活动的诠释，这也是奉小明王的“明”的注脚。在这里顺便说明一下，“小明王”为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为区分明王与明朝而特意加了一个“小”，以示明朝之大。朱元璋在建立政权之前，起事时，也是依附了（小）明王，逐步壮大而建立政权，他以“明王出世”自居，所以用“明”为国号，以尊“明王”号召天下，统一天下。石刻内容与明末时期提出的抗清复明有着本质的区别，但相同一点就是反对少数民族的统治地位，所以有人将它理解为抗清复明建基所举行三百年祭，为复明的注解。



澳前村摩崖石刻

石刻“贵人士鬥”中“贵人士”应指蒙古人。“鬥”在古代只有斗架、战斗的意思（简体“斗”在古代为盛酒器、容量单位及星宿名的意思）。整句意思就是反抗蒙古人统治，与自称一等人的“蒙古人”战斗。那么“天地日月 / 汉韶路 / 乐 / 贵人士”就与小明王提出的口号“山河原有中华祭，日月重开大宋天”的意思是相同的。元朝统治者为了巩固蒙古贵族的统治地位，实行民族分化政策，把全国各族人分为四等。地位最高的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汉人”，地位最为低下的是“南人”，包括原南宋统治区域的百姓和其他各族人。许多参加红巾军的农民就是为了改善生活，为的是“明王出世”。其意思为：让汉人与蒙古人平等生活，恢复中华，宋代天下就是汉人的天下，也就是汉人与各民族平等生活于天下，而不是元朝民族分化政策。这是起义

石刻“贵人士鬥”中“贵人士”应指蒙古人。“鬥”在古代只有斗架、战斗的意思（简体“斗”在古代为盛酒器、容量单位及星宿名的意思）。整句意思就是反抗蒙古人统治，与自称一等人的“蒙古人”战斗。那么“天地日月 / 汉韶路 / 乐 / 贵人士”就与小明王提出的口号“山河原有中华祭，日月重开大宋天”的意思是相同的。元朝统治者为了巩固蒙古贵族的统治地位，实行民族分化政策，把全国各族人分为四等。地位最高的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汉人”，地位最为低下的是“南人”，包括原南宋统治区域的百姓和其他各族人。许多参加红巾军的农民就是为了改善生活，为的是“明王出世”。其意思为：让汉人与蒙古人平等生活，恢复中华，宋代天下就是汉人的天下，也就是汉人与各民族平等生活于天下，而不是元朝民族分化政策。这是起义

者盼望着平等生活的一种美好愿望，也是为什么石刻会在宋代太子楼遗址附近的石壁上的缘由。“山众/黄文秀/起□小主”中的“众”应为众人之意，它点明了南澳红巾军起义的领导者就是“黄文秀”。黄文秀虽无法考证，但他是石刻内容关键焦点。“贵人士□山众”整句话也可以解释为蒙古贵族对民众的压迫已经到了揭竿起义的时候。“起□小主”就是奉小明王为主的暗示，是“天地日月”的解释。“廣三百”中的“廣”字在春秋时为楚国兵制（在这里不是现代简写的“广”字），兵车十五辆为一廣。因而“廣三百”在这里泛指许多人参加起义。“丁酉年□”就是小明王的龙凤三年（元至正十七年，即1357），这可能为起义的时间。“壬寅生三月□”，壬寅年即为龙凤八年（元至正二十二年，即1362），有其双重含义，其一，“生”通“牲”，从丁酉年至壬寅年刚好五年，它或许揭示了黄文秀领导的起义军在这里举行某种祭祀活动。与第一个时间“丁酉年”相互印证，也许为刻石时间。其二，为扶乩之语。中国人相信五行，“壬”属“水”在北方，暗示了元朝是来自北方的蒙古族，“寅”属“木”在东方，在《诗·齐风》“鸡鸣”：“东方明矣，朝既昌矣。”它从侧面诠注“天地日明”就是“明”字，光明之意，揭示着在东方太阳升起的地方，光明必战胜来自北方的黑暗。虽然黄文秀领导的元末起义军在南澳的活动情况已无法考证，志书也未曾记载，但从这历经风风雨雨、人道沧桑而残存的石刻，我们看到南澳历史的年轮；看到南澳一段消失在地平线上的记载。

这石刻填补了南澳明代以前的历史空白，揭示了在明万历三年（1575）南澳设镇建制前就已经有屯兵和人类活动的史实。它反映了澳前村当年曾有繁荣村庄及相当规模的贸易活动，是南澳最先开发之地。也说明了为什么南宋皇室驻跸澳前村逾月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元末农民起义发生在澳前村的原因。

七、宋元沉船遗址见证南澳的繁荣和海贸昌盛

2007年5月26日晚渔民准备盗掘“南澳 I 号”明代沉船遗址时在云澳镇东南的“三点金”附近海域发现“三点金”宋元沉船遗址，共收缴黑釉盏、

青白釉印双鱼纹碟20件。据初步判断为宋代晚期的外销产品。黑釉盏，高4.3厘米，口径11.1厘米，足径4.8厘米。器口外撇，斜壁，浅圈足，通体施黑釉，外壁釉不及底足。青白釉印双鱼纹碟，高2.6厘米，口径13.6厘米，足径4.7厘米。碟宽，毛口。浅弧腹，低圈足。碟内贴相对的模印双鱼。胎青灰细腻。由于夜间行动难定位其沉船具体地点。

正当我们在苦苦寻找“三点金”宋元沉船时，2015年6月24日17时07分笔者接隆澳边防派出所任敏威所长电话，报告后宅渔民在云澳三点金海域潜水捕鱼作业时无意中发现了古瓷器4件。笔者随即与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建武同志到达隆澳边防派出所。据渔民口述，他们在离“南澳Ⅰ号”大约1公里海域进行潜水捕鱼作业时，发现了一些瓷器，并且潜水人员还看到船板与石块。在隆澳派出所现场看到瓷器4件，其中3件黄釉碗、1件青白釉碗（有裂痕），现场对文物进行初步鉴定，判断为南宋外销瓷器。随后分别向汕头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文物科和县委宣传部报告，并要求隆澳边防派出所向边防大队、南澳公安局报告。为了更好地摸清沉船位置和 underwater 文物情况，特请汕头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向广东省文物局与省文物考古所汇报，派专家到现场鉴定和 underwater 摸查。

在广东省文化厅、文物局以及汕头市文广新局的直接关注和指导下，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专业人员进驻南澳，物探组于7月7日到达南澳岛，潜水组7月10日也到达南澳。由于台风“莲花”在粤东海域登陆，直至7月11日物探工作才开始，通过2天工作，以线报方位为中心进行了大范围的扫



“三点金”海域发现的瓷器



“南澳Ⅱ号”前期出水的瓷器

测，物探设备以多波束、浅地层和旁侧声呐同时进行，扫测面积超过6万平方米，通过对多波束等图形判读，共筛选出7个可疑点；7月12日，潜水组开始对疑点进行排查；7月14日，潜水探摸终于有了结果，两组潜水共采集瓷器11件；7月15日，两组潜水共采集瓷器14件，其中完整瓷器3件，从而基本确定这两天的潜水点就在沉船附近。由于目前该沉船还未进行正式发掘，根据在小范围内发现大量年代一致的文物即可定性为沉船的标准，并结合沉船命名规范，该遗址可以命名为“南澳Ⅱ号”。

我们可以想象，其时南澳海船穿梭往来，帆樯林立。或靠泊南澳进行补给，或在南澳进行现场交易，或以南澳为出发地，或以南澳为终点港。四通八达的海路，吸引了不远万里驾舟而来的中外商人。进一步确证南澳在唐宋时期海上贸易中发挥过关键作用，是潮汕对外贸易海上船舶驻泊之地。

注：

- (1) 陈天资：《东里志》卷二《境事记》。
- (2) 《隋书·陈棱传》。
- (3) 《唐高宗敕陈政镇守泉潮》转引自《颍川陈氏开漳族谱》。
- (4) 《白石丁氏族谱·懿迹纪》。
- (5) 马文宽、孟凡人：《中国古瓷在非洲发现》，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
- (6) 《五代史》卷六十八《王审知》。
- (7) 叶文程：《宋元时期东南沿海地区陶瓷外销》。
- (8) 王文强：《略述我国陶瓷的外销及其影响》。
- (9) 马文宽、孟凡人：《中国古瓷在非洲发现》，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
- (10) 陈历明：《潮州史话》。
- (11) 彭韶：《边方大体事疏》，转自陈子龙：《皇明经世编》卷八十《彭白二公集》。
- (12) 陈梅湖：《南澳县志》卷二一《艺文》，1945年。

- (13) 陈梅湖：《南澳县志》卷一二《祀典》，1945年。
- (14) 陈天资：《东里志》卷二《境事记》。
- (15) 陈梅湖：《南澳县志》卷一八《古迹》，1945年。
- (16)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312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
- (17) 林天（点校）：《宋元明清潮州民变资料》，《汕头史志》1992年第2期。
- (18) 王欢：《汕头市（南澳）海丝文物史迹考古调查、勘探工作报告》，参与调查：邹池根、龚海洋、黄迎涛、罗海涛。
- (19) 徐起浩等：《关于“沉东京”传说的史学、社会学和地学的综合考辨》，《泉州文史》1989年第10期。
- (20) 《四角号码新词典》，商务印书馆，1978年。
- (21) 徐红岚：《关东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藏古籍概述》，《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94年第4期。
- (22) 徐起浩等：《关于“沉东京”传说的史学、社会学和地学的综合考辨》，《泉州文史》1989年第10期。
- (23) 《清史稿·列传·吴桂芬传》。
- (24) 黄挺、陈占山：《潮汕史》，第265页。
- (25) 《南澳文史》第二辑《澳前摩崖石刻初探》。



海上丝绸之路
研究书系

港口篇

南 澳 港 港 与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

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

◎ 编

黄迎涛

◎ 著

SPW

广东人民出版社
Guang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责任编辑：毛一飞

责任技编：许伟斌

装帧设计：WONDERLAND Book design
仙境 QQ:344581934



ISBN 978-7-5454-5482-6



9 787545 454826 >

定价：46.00元